

#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9期 2011年9月10日

##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反专制宣言.....	2
“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些思考（丁弘）.....	4
民办教师挑战大学教授的两封公开信（闵良臣）.....	13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孙正荃）.....	18
沉重的回忆（王桐初）.....	22
上海女人（杨显惠）.....	30
从“红小鬼”到“右派”到.....	
——忆诗人孙静轩老师（黄晓龙）.....	44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林宪君）.....	51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55
党说你不是，你就不是（佚名）.....	56

编者说明：本刊原意刊载交流文稿，因读者群中有许多是不会或不常上网的老人，应这些读者的要求，特地在正刊之外另办了一个网络文摘增刊，以选介一些网络上流传的好文章。由于正刊来稿多为老人的苦难经历，有读者反映，希望题材多样，避免题材单一引起的阅读疲劳。现决定从第8期起，将网络文摘增刊合并到正刊中以拓宽题材，调剂阅读情绪，增强可读性、趣味性。希望大家本着“抢救记忆，追寻真相，交流信息，积累资料”的宗旨继续赐稿或推荐好文章（注明来源）。 邮箱：[bsyy1957@Yahoo.cn](mailto:bsyy1957@Yahoo.cn)

#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反专制宣言

##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解放日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是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刘少奇）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摘自刘少奇《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2月），原载中共中央中原局刊物《江淮》创刊号，后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6—177页。

## 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董必武）

我们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么实际工作呢？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这在上段已经讲过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及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行了“三三制”。什么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摘自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1945年6月5日），为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在华侨举行的会议上的演讲，后收入《董必武选集》，第111—112页。董必武（1886—1975），中共创建人之一、“一大”代表，历任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院长、陕北中央党校校长、中共南方局副书记、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 实行三三制，反对一党包办（解放日报）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 希特勒的“民意”（新华日报）

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彩，“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末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3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短评

## 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新华日报）

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会议里，通过了张君励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张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这次提案的内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

张先生所说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结社集会自由，三、言论出版自由。第一项自由，是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审判和处决。第二项自由，是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体发抒政见；第二，各种政治结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之人，使其发为负责的言论；第四，在朝党在野党各有互相监督之机会。”其主要建议，是人民可以组织团体、政党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第三项自由，是为了人民能够发表意见、批评，监督和改正政治及社会等等的各种设施。其主要建议是实行图书杂志新闻的事后检查。张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经涉及了重要的三项。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帜。因此，我们和张先生一样，很重视这三项人民基本权利。

.....

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要根据实际情形、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可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权利，民主必须

以广泛的人民为基础，却是不能改变的原则。这样，人民必须获得基本权利，并予以保障，难道还有怀疑和犹豫的余地吗？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战后和平，为了政治的进步，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 1944 年 2 月 1 日

【以上均引自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 “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些思考

丁 弘

【丁弘按语】此件不能说是“文章”！不过是随意谈开去。有的朋友说能否把这些问题谈得通俗一点，主张通俗、通俗、再通俗，不要引经据典，让更多的人看得下去。所谓通俗，是要深入浅出，这是高的要求，不是太好办的。试着以谈心的方式写写。肤浅、不妥处，请大家指正。

### （一）中国又到了十字路口吗

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总是成为人们思考的中心议题。晚清戊戌政变时，辛亥革命时，新中国成立前夕，莫不如此。近 20 多年，改革开放使社会有了巨大进步，但主要还限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滞后，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历史又到了关键时刻了。

现在是怎样的局面了呢？

4

2007 年上半年，沙叶新先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有一篇大文章，题目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话是否有些耸人听闻呢？下半年，十七位前部长联名上书党的十七大。其中也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提法和主流媒体的说法是相反的。在报刊电视上看到的是形势大好、莺歌燕舞。对此群众看惯了，理解这不过是宣传的需要。沙叶新等都举出了大量论据，认为腐败严重了，两极分化了，环境污染了。矛盾积聚，已经危机四伏了。沙叶新和一些前部长的观点好像一样，其实又完全不同！前者认为问题出在没有决心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监督机制，“德先生”没有到位；后者认为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应下决心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上来。阶级斗争的观点不能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

这样说来，在中国面前摆着两条路，又到了历史关头。何去何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中的这句歌词，唱了几十年了。当年把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支歌定为《国歌》时，有人觉得歌词过时了。郭沫若还写了《新华颂》应征国歌歌词。中央讨论最后还是采用了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说：“居安思危嘛！”没有想到历史道路曲折，今天还用得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田汉亡故于“文革”，尸骨不存。他的骨灰盒里，只放着这首歌的歌词（田野同志——田汉的女儿说，里边还有一个剧本《关汉卿》）。在国家的灾难中，田汉丧失了生命，留下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真是悲壮的人生戏剧，真是语重心长了！

审时度势，中国向何处去？李锐同志说：“现在是左右为难。”这是替领导设想的话。无疑，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关阶段。

### （二）民主，历史的大趋势

2007年2月，谢韬同志发表一篇文章，说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方面他是正面回答中国应向何处去；一方面是对“共运史”的反思，说明历史证明了我们只有走这条路才是对的。

他的历史评说是：第三国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的是修正主义，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搞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恩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到晚年，他们从实际出发，对过去的观点有所扬弃，而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途。近百年间，社会党沿着这条路，取得辉煌的成就。谢韬同志说：“他们以此告慰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天之灵。”

这话分量太重了，这把“伟大的”列宁置于何地？这样讲，一贯自诩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怎么说呢？其实，不是谢韬或是什么人这样说，而是“历史老人”以事实作出了这个结论。

为一篇文章，中央不得不表态，其中有“不批判”一语。按照革命传统的立场，怎么能不批判呢？原因可能是：一、考虑国际影响，有几十个社会党在那儿呀！二、考虑国内社会的安定。三、恐怕更重要的是谢文具有真理性，民主是历史的大趋势，越批越被动！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小文章《答读者问》，体现“不批判”的精神。本报不作答、不表态，请专家来回答，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文章还是坚持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处理，是各抒己见，不是思想垄断的架势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我们注意到，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意见没有正面接受，但没有批判的语言，而“民主”思潮的影响是明显的。“民主”是报告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国内外传媒都说达60次。说明党对推进民主进程多有考虑。而对否定改革，留恋过去的思潮，则是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

这样稳步发展，国人感到高兴，深得人心！

政治家和理论家考虑问题当然不同。按理，政治家应向理论家请教。现在经常请他们讲课了。比较而言，政治家更多考虑实际情况。

### （三）总结中国革命，先要说清列宁的问题

理论家还是应追求真理，理论不能做“政治”的奴仆，政治家强调“要有科学的发展观”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对历史教训所作出的回应。而在事实上，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难有科学的发展观。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可以呢？

许多年前，一位出版社的长者给我指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首先要说清列宁的问题，否则是说不清楚的。

列宁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民族，传承着千年专制主义的文化，对领袖是极尽其圣化、神化之能事。对他们的话语加以教条化，称之为“经典作家”。因为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专政的情况下，一般人不敢说半个“不”字。列宁百年之后的今天，社会大有进步了，很多人仍感到余悸犹存。

列宁所开辟的这条路，造成了怎样的结果呢？

一、今天俄罗斯的教科书，已经把“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即不承认它有什么革命的进步意义了，它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把社会又拉回到专制主义的政体中去。

二、1991年，前苏联海军将领，齐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降下了红旗，庄严地升起“二月革命”那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肯定民主革命的成果。

三、列宁格勒这个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举行全民公决，多数人投票赞成改名为“彼得格勒”。历经 74 年岁月，人民还是抛弃了列宁，反而赞成彼得大帝。我们也只有声明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

四、谢韬同志说：“他们当然比我们更了解列宁，他们否定了列宁，我们为什么还要把他奉为神灵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在于列宁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儿只能是概括地说说：

一、他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硬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是行不通的；

二、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已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了。情况并非如此。他没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三、“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学说，是为了集中，不是为了民主。列宁提出时，即受到一些思想家、革命家的反对。认为它不过是“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对那四句话：“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都是为了集中。民主生活，本身包含着少数服从多数，不需另讲什么集中，在封建性的官本位社会中，上级是谁？组织又是谁？是人民在上，还是官吏在上？按理大家都在“法律”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克林顿在秦俑馆门前和一个小学生有一次这样的对话，小学生说：“你领导着全美国人民呀！”克林顿说：“你说错了，是全美国的人民领导我。”

在“民主集中制”中少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多数要尊重少数”。因为真理常是在少数人手中；在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行者总是那些少数人。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民主集中制”无益于民主。直到今天，大家还认为它是正确的。这是思想垄断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 （四）列宁主义果真到了中国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是列宁主义，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当然包括恩格斯，随着形势的发展，思想有了发展了。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列宁主义对照一下，也就知道了。

一、他和列宁一样，忽视社会的经济基础，加快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空想。均贫富、穷过渡，社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死胡同，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连胡乔木这个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组长，也为《决议》没有严肃指出毛的这一错误，而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这是最大的教训。遗留的问题怎么办呢？只好回头进行补课了。

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据，理直气壮地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转移到北京了。“中国应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人（我）的身上了。而这时人家正在兴旺，我们严重的困难已经到来了。

三、“民主集中制”是为了加强纪律性的。是和限制自由、否定民主、剥夺人权的专制主义配套的。它和中国专制的文化传统一拍即合。1943 年在中国具体形成了“个人有最后的决定权”，一步步把漫长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专制主义推向了极至。还认为是执行得不够好。

#### （五）李大钊只介绍晚年马克思

建党之前，“五四”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则真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李大钊介绍的是马克思晚年成熟时期的思想。他这篇著名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连载。通俗、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说，对其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是介绍了“社会党”，当时欧洲涌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他从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五四”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当然，有民主才有科学，要科学就需要民主，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专制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的思想体现着科学与民主的统一。当然，他对马克思十分崇敬，但不是个人崇拜。他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发现马克思的理论还有不够严密的可以推敲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一生的两大发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概括的，一是唯物主义，一是阶级斗争）。社会的发展究竟靠的是什么？是发展生产，还是靠阶级斗争？李大钊认为马克思未能自圆其说。他认为阶级斗争天天在破坏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文明。所以他把“斗争”总是译为“竞争”。社会是在“对立统一”状态中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不是“消灭”，而是“扬弃”。

其实，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早已超越了自己。

## （六）世上没有“经典作家”，《共产党宣言》的局限性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主义的幽灵……”马恩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即可见其文笔的恣肆、潇洒，视角的高屋建瓴，其思想的深邃教育了一代代共产党人，我们从来奉为经典，认为是金科玉律，认为句句是真理！

事实上，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经典作家，马恩，更不要说毛泽东，他们的思想同样要通过实践的考验。

7

马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共产党宣言》，今天看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但也明显有着局限性。这毕竟是马克思 27 岁时写的。三四十年之后，他们涉世渐深，渐有所悟。恩格斯说：“看来我们是错了。”马克思更是谦虚地说：“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五次提到他的这句话。马克思的女婿，在打着他的旗子活动，他生了气，说：“见鬼去吧！”

《宣言》中的局限性，恰恰成了列宁，接着是斯大林、毛泽东，打出的大旗。什么局限性呢？简言之是四点，“两个决裂”其一是“和私有制决裂”；其二是“和私有观念决裂”，第三要搞“暴力革命”，第四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

青年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受到的残酷剥削，无比义愤。其理论的思考也带有革命激情。年事渐长，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之后，并不是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是社会可自我调节，反而又有新发展，他进而多了冷静的理性思考。

马克思是谦虚的。他甚至不承认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一是他的理论还没有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马克思身后，恩格斯所做的工作；二是他的思想是一个发展“过程”，在理论上讲，相对真理的长河才是绝对真理。什么算是“主义”呢？

列宁，以至毛泽东所高举的是青年马克思在《\*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概念。批评马克思是不对的，因为那是马克思早年的观点。但是，用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只好略说几句了，所好这已是历史所作的结论。

一、关于消灭私有制。物质上的私有，是独立人格的基础。没有私有的物质条件，即谈不到独立的人格。毛泽东对消灭私有制做得彻底。人只能是“螺丝钉”、“驯服工具”等。人民公社的社

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而丧失了一切自由，甚至想通过辛勤的劳动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也丧失了。恩格斯整理出来的《资本论》第三卷中，为什么提出“重新建立私有制”呢！

二、关于和私有观念的决裂。毛泽东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是这个精神。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要求。作为特殊情况下的要求可以，作为普世的道德规范不切实际。荀子说：“有欲必有私”。这是事实。对“私”应该尊重，只能是疏导和利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源泉，而平均主义的“大寨工分制”造成亿万农民磨洋工，破坏了生产力。

三、关于暴力革命。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要革命只有揭竿而起。但是回头看看，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从陈胜、吴广、洪秀全，到斯大林、毛泽东，这些革命者，哪一个不是“人一阔，脸就变”（鲁迅语）。都是正义的革命，得到非正义的结果。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民主机制后，有了选举制，有了议会制，马克思在 1872 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可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也许还可加\*们荷兰，工人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恩格斯说，过去革命的形式已过时了，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的成就了。他劝工人阶级不要再搞暴力革命了。这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

到今天，仍有人强调暴力革命，还认为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想到距马克思去世又已百年过去，这不是闭着眼睛，不看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吗？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的专政”是虚幻的，不过是党组织自称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专政，而“民主集中制”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则造成个人独裁。这种专政，专谁的政，如何专政？都是随意性的。列宁他们首先杀害了早已逊位的沙皇家族。斯大林杀害了包括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的第二把手）在内的绝大部分列宁的战友，建立了“契卡”的恐怖统治。

8

【注：这儿提供两个资料：

一、1998 年 7 月 17 日，在圣彼得堡的大教堂里，重新隆重举行了对末代沙皇全家的葬礼。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携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为杀害他们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表示忏悔”。

二、斯大林的特务统治，把党的精英消灭得差不多了。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 15 名人民委员，除列宁等 5 位早逝之外，其余 9 名全被处决了。苏共第十七大代表 1966 名，1108 人被捕；139 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 110 名被处决或自杀。部队的情况更加严重。包括多数元帅，多数高级指挥员在内的苏军军官 35000 被杀害。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说苏联的优秀干部已被斯大林消灭了。1990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 年，苏联克格勃领导人先后公布了骇人听闻的数字。总之，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 25 年中，死于非命的下限在 2200 万人。】

毛泽东也这样做，还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的对象，说他们是和无产阶级较量的力量。凡此种都不反映革命的需要，都是非正义的。个人的权威是第一位的。暴力革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都是不择手段的，毛泽东说得清清楚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力行为，即普翁所言：“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这是合乎生活逻辑的。

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实行过。将来呢？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白领阶层占重要地位，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了，更不会有什麼无产阶级专政了。

列宁第三国际这条路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专制的社会主义，集权的社会主义，是官本位的社会主义，权不在民。



其实，民主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要科学就要民主，有民主才有科学，把“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看，在概念上是不合逻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专制的社会主义”——如果还可叫社会主义的话。

### （七）苏联的败亡和俄罗斯的复兴

列宁缔造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历时 74 年。叶利钦说：“这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这些年，我们常说，“苏联红旗落地了。”有人却说：“苏联何曾飘扬过红旗！”实质上，“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1991 年，苏联解体，分解为 15 个国家，苏共解散。全国静悄悄。没有抗议，没有斗争，没有人起来捍卫这个党，这个国家。真是瓜熟蒂落，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败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民主，是集权，是垄断，他具体分析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整个人类已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国家被历史所否定是必然的。

俄罗斯重新升起了“三色旗”，是对 1917 年“二月革命”实现了民主共和的肯定。现在，他们解除了“党禁”，实行了多党制，废除了一党专政，解除了“报禁”，新闻有了自由。司法独立了，地方司法机构直属中央，对宪法负责。他们对全民公决特有兴趣，以体现权力在民。总之做到了“三权分立”。在社会变革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把“政治改革”放到前边。

俄国的变革，采取“私有制券”的休克疗法，是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很快过了关。开始说他们生产下降 50%，实际上不是如此。因为公有时，多“谎报以邀功”。改为私有制后，则多“瞒报以避税”。所以统计的情况是不实的。

9

这些年，GDP 以每年 6% 左右的速度发展，这是理想的。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他们生产增长的受益者是弱势群体，最低工资是中国最低工资的三四倍。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坏。

苏联的变革，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呢？有人觉得那里资本主义复辟了，苏联人民在受二茬罪了，而且把罪过归于个人，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叛徒！认为这种变革是没有必然性的。不过是当权者领错了路。

认可这种观点，是现实的一种需要。

当年中山先生看到“十月革命”，一时大受鼓舞，大笔一挥“以俄为师”。不久看一看又说：“社会主义不应是恐怖的。”于是他致函社会党国际：“请帮助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并亲赴欧洲社会党总部联络。而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说：“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那是糟蹋了社会主义。”后来，他甚至说：“人类若要进步，必须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格柏乌即苏联的“契卡”、“克格勃”。

苏联的变革是退出了走不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死胡同，重新肯定了政治上的民主共和，这是世界的潮流，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

### （八）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没落地

苏联败亡于“三个垄断”，我们举的“红旗”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传来的，不也是“三个垄断”吗？为什么我们的“红旗”没有落地呢？

我们垄断的程度，不差于前苏联，竖比“史无前例”，政治上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延用的还是秦嬴从上到下的“封官、建制、牧民”。只是“万岁”之声喊得更响了。封建时代喊万岁，不过是“朝仪”，老百姓还喊不到。1951 年的“五一节口号”中，毛加上“毛主席万岁”，而后，个人崇拜日甚一日（英语“个人崇拜”和“邪教”是同义语），万岁之声震撼中华大地！最后

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甚至说“我就是无法无天”了。

经济上从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私有制，全民所有制不过是“国家所有制”，和封建时代比，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社会资源抓在手中。亿万人民，包括农民变成了无产者。独立人格的一点物质保证也丧失了。经济垄断的程度是古今中外少有的。

思想垄断更创了历史的纪录，以“反右”为例，说是打出 55 万右派（近期反右档案解密，右派实为 317 万 8 千 4 百多人），严重性是封住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嘴巴。大脑普遍丧失了思考的功能。只有一个人可以思考，所谓“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知识产品、知识分子的稿件一律不再发稿费，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费（文革中他拿到一亿三千万以上）。历次运动，冤魂遍于国中，“大跃进”饿殍以千万计，毛泽东去世前，仍以票证控制个人消费，如每人每月 4 两油等等。

但中国的“红旗”不倒，这是聪明的中国人及早找到了打开历史闸门的钥匙——否定了“两个凡是”！

1991 年，苏联、东欧一批国家“红旗”落地，而中国在此十年之前，80 年代初否定了“两个凡是”，使中华民族得以松绑！

所谓“两个凡是”，是毛主席逝世之后华国锋时代提出的口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决策，始终不渝地坚持”。

毛去世之前，给小平同志一顶帽子：“反革命的总后台”，被关押于东交民巷 6 号。粉碎“四人帮”后，否定了“两个凡是”，才为小平解除羁押得到释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中国人从神权、皇权中解放出来，称之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人们形象地说：“建国，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还只能是弯着腰；推倒两个凡是，直起腰成为可能。”

小平复出，他重新收拾旧山河！

翻天覆地，针对毛的时代，有四大否定：

一、否定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多年已是我国广大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公社社员陷于“农奴”的地位，所以人民公社呼啦啦一风吹，全国悄然无声，是瓜熟蒂落了。

二、否定了“计划经济”。当时批评它是“大锅饭，养懒汉”。不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多种经济成分逐步出现了。

三、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发展靠什么？这是从马克思一生两个发现中的一个发现“阶级斗争”转向另一个发现“唯物史观”。

四、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自称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

这些都是毛泽东一生所惨淡经营的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伟大事业。

乔石同志说：“什么是邓小平思想？就是纠正毛泽东错误思想的思想。”这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意见。

小平同志后来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其实，他早已这样做了。基辛格对他说：“你是一个说得少，做得多的政治家。”

中国人民从陷于封建复辟（当时人称封建法西斯主义）困境中相对得到解放。这是“红旗”没落地的原因。

例如农民对自己的产品有了部分的分配权。所谓“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知识分子不再姓“资”，而是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等等。从桎梏中松绑，这给了人民希望。

我们不能否认尼克松这个反共旗手的睿智，他十年之前即预言“苏东”的命运了。有《1999不战而胜》一书，关于中国的部分，他高度评价小平同志，认为只要按他指的路走，21世纪中国肯定是个超级大国。这本书先是作为“内部参考”，后来以精装本上了全国新华书店的书架。

尼克松是够乐观的了，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会引出政治改革。其实还要走着瞧。

### （九）给“资本”平反，找回先进生产力

毛泽东晚年批邓，有“最高指示”，说“这个人从来不关心政治，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毛所说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1975年，邓复出时突出抓生产（整顿），他有意见了。

“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据说是刘伯承同志讲的。但确是小平同志思想的主心骨。在改革开放工作中，他总是用“猫论”排除障碍，发人深思，振聋发聩！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说“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后来又说“不管姓公姓私”，都是“猫论”的运用。甚至说：只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叫什么主义是次要的。说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试想，不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的吗，怎么不坚持了呢？这是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伟大之处。

11

特别是他在南巡讲话中谈到自己没看过《资本论》。这不一定是坏事，“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知这和我们党后来给“资本”平反有多大关系。总之，我们终于给“资本”正名。这是又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我们党在十六大的报告中这样讲了（其实早这样做了）：“劳动创造财富，资本提供条件。”各按贡献进行分配，这样，“资本”和“劳动”平起平坐，都是生产要素。资本不再是剥削的手段，不再是“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脏污的东西”了；拥有“资本”的再不是“资本家”而叫“企业家”，他们也是生产力的代表，可以入党。

这样，阶级分野不存在了。

这样，“反对剥削”这个革命的根本动因，根本不存在了。当年，资产阶级不仅是反封建的主力，而且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不是并列词汇。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华民族之中，所以归根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即全民的党！国家呢？不讲阶级了，当然是全民的国家了。

由此可见，“资本”的平反，是又一个打开历史闸门的钥匙，似只有如此才把先进的生产力请回来。

什么姓资、姓社！什么这主义、那主义！都是文牖上的游戏了。

可是，我们仍打着“红旗”说这主义那主义。如果从生活实情看，难以自圆其说，人家说我们丧失了“话语权”。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回答：

一是小平的回答，他是一个铁腕人物。他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即：别谈什么主义了，我怎样说就怎样干吧！

一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回答：“我们现在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不过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反封建基础上建立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种是专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

当然，当前最好我们还是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和过去说的社会主义不同了。过去讲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讲了几十年，干了几十年。现在发展私有经济（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到“大力发展”），按生产要素分配，培育市场经济了。和过去完全翻了过来。

过去的概念叫“社会主义的特征”。现在的概念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史家称，我们现在是“打左灯，向右转”。

不要忘记鲁迅先生的话，“面子，是中国人的纲领”呀！

我们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所以早有人建议党的名字改为“社会党”更为合乎实际。但是，改可能有副作用，可能影响安定。所好名字是次要的。关键是看党做什么。

#### （十）咬文嚼字说“民主”

现在情况不同了，有人说似在搞民主社会主义了。过去强调“斗争”，以斗争为纲。现在强调“和谐”，要建立“和谐社会”，甚至“和谐世界”。对民主社会主义，谢韬同志的文章说他们化解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矛盾，化解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矛盾，以此告慰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天之灵。我们否定了阶级的存在，不是更“化解”了吗？在一个国家里可以“一国两制”（指对香港）和平共处，不是也化解了吗？过去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谦让。”现在相反，强调“八荣八耻”了，讲道德、道义、公正、良善了。这不是在搞“民主社会主义”了吗？

还不能这样说，根本问题在于是否“权力在民”，是“人民作主”还是“为民作主”。史家说：中国的社会发展，跨过这一关不容易。甚至说这是“千古难题”。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不妨咬文嚼字，把道理讲清楚。

人民政府门前，写着毛泽东题的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主语”是谁？是“我”是“官”，所以本质和过去一样还是“官府”，标榜做一个“清官”而已。为人民，可以为，可以不为，老百姓作不了主。

近年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称之为新三民主义。其实不新。不过是把“为人民服务”具体化了。主语还是“官”，说“官”应如何“为”。这仍是“官本位”，其上层仍是“当朝”，口头上还不如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呢！

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生”。主语是“民”，不是“官”，体现民主意识。这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有本质区别。

毛泽东也经常谈到民主，但是只谈民主作风，而不谈民主制度。他对此下限把握的严格，最后仍是居于“党”之上、法之上。“君临天下”觉得理所当然。全党、全国人民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此赘语，实因怎样从“官本位”转向“民本位”，从“为人民服务”转向“人民作主”，从“人治”转向法治，从而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很难。一般人对什么是“共和国”没有去想。不妨去查一查《辞典》，然后对照我们的现实生活。孙中山先生临终前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有人为了既得利益，有人受到愚民政策的影响，总是想出许多理由，阻挠我国民主化的进程，说“国家太大”呀，“群众素质低”呀，“搞起民主来国家要乱”呀，等等。近现代史充分证明，只有实现了民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专制体制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总要引发出动荡来。认为人民素质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素质比村民低吗？现在的中国人比两百年前的美国人素质低吗？当然不是这样。

2007年10月，法国播出十部纪录片，反映十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情况。他们对中国友好而又是语重心长，反映武汉市一个小学的班级里，孩子们在老师辅导下，很好地进行了“民主选举”班长的政治活动。都是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呀，说明“天赋人权”。中国人的素质不差呀。半个多世纪之前，为了夺取政权，我们也高呼“民主”，农民用一颗黄豆投在碗里，可公开选举村长，做到那样公开、透明。当时人民都相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是没有什么自己的利益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久居领导地位的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能否“立党为公”的考验。现在，我们似不应有什么怀疑了。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有的放矢地这样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权，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应为他的这番话热烈鼓掌！

这样做，中国大有希望。这是民族之幸！

我们都应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

〔据丁弘《交流文稿》（2008年第1期）〕

## 民办教师挑战大学教授的两封公开信

闵良臣

**编者按：**闵良臣，1956年8月生，河南商城人。曾任民办教师，1980年6月被招工到企业当工人，1993年5月起任河南省第二纺织机械厂厂报编辑。1986年7月开始发表作品，现任职于某媒体。发表有随笔《偏爱读鲁迅》、《写在“春”来时》、《戏剧不宜改良》、《不想“高级”》、《我的“不设防”》、《天地日月之所以伟大》、《都是找我要钱来》，杂文《“某”的自诉》、《一个十分荒唐的结论》……

下面是闵良臣先生写给南开大学逢锦聚教授的公开信，就其《中国道路的客观性》一文，发表评论。信后附《中国道路的客观性》一文，以供参阅。

尊敬的逢教授：

你好。首先就要感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因为这篇文章是以你的署名发表的，而不是这家作为一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发的社论，更不是什么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或指示，不然，我就只有阅读和学习的份儿，而没有评论尤其是没有批评的机会了。

这种国情，我不知你是否也赞成也喜欢甚至也还认为是客观的，反正我是不赞成更不喜欢也还认为是不客观的。

从学理乃至法理上讲，如果说人人都是公民，那么我们在人格上就都是平等的。在一个国家，不管什么人，他公开所说的任何话，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应该在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之列，而对于公众人物，尤其如此。

然而我们不是。非但不是，往往还恰恰相反：这个公众人物只要到了一定级别，他在公开场合所讲（不是“说”）的话，除了同样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港澳地区之外，身在大陆的中国人是没有公开讨论更没有批评的资格的。即使有好事者在相对自由一点的互联网论坛上偶尔说一说，也往往会连累网站，甚至还会让网站受到警告之类乃至要暂时关闭几天。

你觉得这种国情也正常也客观吗？你认为这也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吗？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中国道路竟为何要这样选择要这样走呢？

自己实在想不通。

尤其我还想问一句：这符合人类的天性吗？

通读你整篇文章，感觉你说得挺平和，但你是教授，一定懂得，平和不代表正确。

在你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实际上就说了三点：

一点是承认并肯定了人类社会发展有普遍道路。这一点很难得。

另一点是认为资本主义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只能算是普遍道路中的一种。

第三点，认为或叫强调，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包括近三十几年来所走的道路，都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似乎还都是天经地义的，而支持你这个选择的就是这么十几个字，即“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

现在第一点不用说，因为我不仅是附和的，也是赞成和支持的。要说的只是第二和第三点。我想至少从道理上讲，你大约也不会认为我这个普通公民也有资格来与你谈谈你所说的这两个话题吧。

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理性的理论家甚至是有理性的普通人会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定义为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即使居住在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资产阶级生活的理论家们或是他们社会的普通公民也不会。不仅不会，还相反。据我所知，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特别反感把人类道路定义为一种什么道路（或叫什么社会、什么主义）。这一点，你一定是清楚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在我看来伟大如马克思·韦伯、冯·米瑟斯、悉尼·胡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尤其是卡尔·波普尔、冯·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不知你是否读到过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一篇生活类的小散文：《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之所以说他小，因为不过 1200 字。可就是这么一篇小散文让我很感动。他在这篇文章中绝没有说什么人类发展的普遍道路就应该是走资本主义——他的学识、他的理性都绝不许他这样说。但他说了这样的话：他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看到的最进步最美好的社会，他也感到他是他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

在这篇短文中，作者热情地讴歌了他的西方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生活（同时他也十分清醒）也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他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

像卡尔·波普尔这样令世人尊敬的科学哲学家谈论他对他所生活的社会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感受，我没有理由怀疑。而且我还有理由认为卡尔·波普尔所生活的“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对中国百姓而言，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就是他们梦中的“天堂”。

既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样一种社会？又是出于什么理由什么心态来拒绝这种社会？我特别想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更没有以这种道路要求全世界普罗大众的国家都去走。人家只是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相对而言，他们所走的道路是目前人类已知的最理性最宽广的道路，他们的社会也是目前人类已知最进步最文明最幸福最快乐最有尊严的社会，他们只是希望我们也能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

这有什么不好吗？又有什么不对呢？包括逢教授在内，你觉得，我们有些人以现在所说的那些所谓“理由”去反驳，真有力吗？又符合逻辑吗？尤其是真的实事求是了吗？

即使被称作西方二十世纪最保守的经济学者之一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结论”中也还是有这样极为客观的一段话：“现在（闵按：指苏联解体前），谁能在支配苏联一切的暴政和专制下看到推进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任何巨大的希望呢？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着：‘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在今天，谁能认为苏联的无产者的锁链比美国的、或英国的、或法国的、或德国的、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无产者的锁链要轻一些呢？”（第19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我知道，自己这样一说，逢教授的“如果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则既不科学也不能令人信服”也就多少有点无的放矢的味儿了。真是不好意思。

这还不算，你接着上面这句话又说道，“各有各自的具体国情，选择什么道路、不选择什么道路是由各国的历史和人民决定的，怎么能说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呢？”表面来看，或是囫圇吞枣地一读，觉得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可只要是长点脑子的人，再稍作分析，就会明白你这些话是很不周延的。

别的不说，逢教授一定知道，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就如同强调民主集中制一样。可中国过来人谁都清楚，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假，集中才是真。而所谓的讲小道理，也是假，我们只要所谓的大道理。可现在的问题是，这大道理是由谁来定的？如果大道理不仅定得不合理，尤其在程序上就不合法的话，你还能去要求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吗？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度，一旦大道理定下后，就不许讨论不许批评，或者说就只能“坚持”甚至还要“绝不”，请问逢教授：这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法理上，你觉得也能说得通吗？

正因为自己并不认可，还在两年前，就不客气地在键盘上批评过这种意识这种说法：

在我们现实中，有些根本就算不上大道理甚至就不是个道理的一些说法，也被有些人定为“大道理”，并强迫不愿意信奉的人们去信奉。这就给我们的社会出了一道难题，那就是谁来认定什么才是大道理，也就是这个大道理到底由谁说了算？难道真的就像有那么几个教授或是什么“研究员”之类的人所说的，历史一“选择”，就由那“被选择”的说了算？如果是这样，那跟过去的“家天下”又有什么两样呢？“家天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因为那天下是他家领导众人打下来的，于是小道理大道理，就都归那一家一姓了。朕即天子，天子一言九鼎。因此，如果说就因为打下了天下，就要说成“是历史的选择”，而一说“是历史的选择”，也就铁定了有定“大道理”的资格，这与“家天下”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

假如我们现在能肯定这是不对的，那么大道理也就不能因为谁打下了天下，就说成是“历史的选择”，然后这个国家的“大道理”就全由这“被选择”的来定。这是很显然的。可看看几十年来，我们一边绝对地反对那一家一姓定“大道理”的资格，可一轮到别人反对自己这一党一派来定“大道理”时，就又不高兴了，就把刚才还反对的话扔到了九霄云外，强调起“历史选择”来了。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同时也有点很搞笑吗？

现在很想请教一下逢教授，你觉得闵某人早在两年前就敲下的上面这段话有问题吗？如果你不认可，那么可否指出，上面这些话是不讲道理还是不符合逻辑。反之，如果你也认为上面这段话说得不错的话，那么，你所说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以及“中国道路的客观性”，又还怎么能说得通呢？

要知道，教授，在我这个没上过学的普通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了不起的，不仅是在他们的认知上尤其是在良知上。一个教授，即一个顶级知识分子。如果一个顶级知识分子不仅在认知上不行，又还失去了良知，那么中国的希望又还在那里呢？

我知道，就你这篇虽然不长的文章内容而言，自己这封公开信仍是挂一漏万；就是所讨论的这两点，也未必细细地说透了。但考虑到这封公开信已经写得不短了，逢教授未必能耐住性子看得下去，因此，匆匆说到这儿，也就想先打住，并希望你能读到它，并能不吝赐教。闵某人这里先谢了。

恭请

逢教授：

你好。很不好意思，这么快就在键盘上给你敲这第二封“信”，真是多有打扰了。

说来不信，这主要是因为我忽然发现，早在去年十一月初，自己就已经在键盘上敲过一则有关谈“中国道路”的帖子，当然不是冲着你来的。当时有位叫周继坚的什么人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坚持走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本人是在新华网上读到的，而且读到后即作出“反应”。

大半年过去，现在又读一遍，感觉把它再抄送给你这个《中国道路的客观性》的作者，不仅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还很合适，故不顾别人会骂我有“炒冷饭”的嫌疑，付诸了行动。

闵某人不敢奢望别的，只想逢教授能丢弃你脑子中固有的意识形态，耐着性子读一遍这则文字，闵某人也就阿弥陀佛了。

原文如下——

### 闵良臣：有些人的“中国道路”是什么道路？

我不知道，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还有什么时候走的不是“中国道路”。或说正因为 we 一直走的是“中国道路”，一直强调要走“中国道路”，才害得今天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到了害怕听到有些人说要走“中国道路”。因为这很多中国人已经知道我们有些人所谓的“中国道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样说，也绝非像有些人那样我要来代表“很多中国人”，而是只要愿意看一看各大网站论坛网民们的跟帖就知我言不虚。

且不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为真理，只说也不知道大半个世纪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歪曲到何等地步，却还美其名曰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道路”不论走得有多么糟糕，也不管这个“道路”与整个人类文明的主流多么背离，更不管这个世界上毕竟存在着的一些“普世价值”，有些人就是只管强调要走“中国道路”。

于是乎，走得也好，歹也罢，由于都可说成“中国道路”，国民也就只好跟着走——不管什么人，再说什么，都是放屁。

按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的说法，这就是我们不讲理：政府不讲理，执政党也不讲理，又于是乎，整个社会也就不讲理了。既然整个社会都不讲理，那么，这种社会的“群体事件”逐年增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要知道，一个社会也像一个人，不讲理，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古今中外，还没听说过哪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居然也能建成“和谐社会”。

此外，这有些人的“中国道路”到底是个什么道路，能不能站出来再作细致一点的诠释，然后看一看你这个“中国道路”几十年来给中国人民都带来了什么？日本 1945 年战败时，容我说句粗话，他们因不自量力发动侵略战争打得“屁蛋精光”，别说什么资源了，连男人都快要成“稀罕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资源相对我们要算奇缺的岛国，一个我们十分厌恶的大和民族，在他们一届又一届的政府——在我们有些人看来——并不英明的领导下，居然只用了三几十年时间，就重振旗鼓，让他们的国民过上了我们直到今天也还只有一部分国民才过上的生活水平。这还不算，人家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数一所二的经济强国。

那些整天所谓“要坚持中国特色”要走“中国道路”的人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好还能解释得多少符合一点科学或叫符合一点逻辑，不要只是用一句什么“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来糊弄国民。

前些天，听说我们统计（注意：只是统计。事实如何，只有天知道）出一个经济数字居然第一次超过日本，于是有人激动得不知所以。可且不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知那个统计数字到底含有多少水分，就算真的超过，又有什么好张扬的：只要一“人均”，就会丑得不行。



可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走的“中国道路”？难道这就是我们坚持要走“中国道路”的理由？几乎一切“进步”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这是一种什么“中国道路”，请把真相告诉所有中国人，看看还有多少中国人打心眼里愿意走这样的“中国道路”。

当然，最想不通的是，你怎么就敢于说你走的是“中国道路”，而其他要求民主自由、强调要真正解放思想的中国人走的就不是“中国道路”？你能说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要走的不是“中国道路”？你能说那位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人之一、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由其主抓并最终制定出举世公认的《汉语拼音方案》、被人们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要走的也不是“中国道路”？你能说凡是那些认为中国政改“滞后”而要求加快速度的中国人要走的都不是“中国道路”？这也有点太扯了吧？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鬼，你说给鬼听鬼都不信。（2010-11-2）

如果逢教授真的读了，我就还是想问：你觉得如何？如果不认可，你觉得它们错在哪里？能不能看到你对它进行实质性的批评乃至批判（本人害怕胡扯）。相反，如果你终于有所觉悟，也赞同我这则文字，那就只能表明你那篇《中国道路的客观性》确实有问题。

你说的是吗，逢教授？

即致

暑祺

闵良臣敬上      2011-8-6

**附：中国道路的客观性** （作者：南开大学教授 逢锦聚 来源：人民日报）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从一般意义上说，这种轨迹也可称为道路。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轨迹，当然也就有自己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对此，世界范围内高兴者有之，不安者有之，试图遏制者也有之。不管心态如何，面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究竟为什么、怎么样实现了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和启示。这大概就是世界上许多人关注中国道路的主要背景和由来。

目前，关于中国道路，国内外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多领域取得的成功，证明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道路”。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根本不存在“中国道路”，谈论“中国道路”是试图以中国的特殊性否定世界发展的普遍道路，而这种普遍道路只能是资本主义道路。

实际上，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中国道路，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社会存在问题，即中国道路的客观性问题，其次才是理论认识问题。且不必追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就从1921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看，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出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还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的有益成果，凝结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本国国情出发进行的探索和创造。对于这样的道路，人们当然可以评头论足，可以肯定也可以批评，但它已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

承认已经形成了中国道路，是否就是以中国的特殊性否定世界发展存在普遍道路呢？恰好相反。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寓于各国发展道路之中，通过各国发展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游离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外，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丰富。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可以讨论，就是人类社会发展是否有普遍道路。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有没有普遍道路，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是什么。如果把人类社

会发展的普遍道路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则既不科学也不能令人信服。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会创造出比它以前的社会更高的生产力，但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仍然不可避免地要为更高级、更美好的社会所代替。更何况，各国各有各的具体国情，选择什么道路、不选择什么道路是由各国的历史和人民决定的，怎么能说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呢？

承认存在中国道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道路是什么？关于中国道路，从广义说，既包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革命道路，也包括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还包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狭义说，就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形成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容。从社会主义还要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角度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必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表现出强大生命力。[转载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孙正荃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曾经这样评论他：“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先生说，“后来果然被应验了，所以我一直铭记心中。”那么先生是什么“性格”呢？他“性格”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我同先生相识相交时，先生已“从鬼变成了人”，我则从大西北回到了大上海，在之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听他讲了许多故事，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那些官场中的“干部”有种天然的距离感，而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却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同时反复提及的两个字就是人性。人性，是他衡量人事最看重的尺度。

这是为什么？听的故事多了，慢慢悟出了点道理。

### （一）

先说一个人物：郭沫若。

贾植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读书时有个同学叫李春潮，他在东京结社写诗，同郭相熟，一次，李的父亲寄来了七十块大洋，他在酒店请客，有郭有贾，两人就算认识了。1954年贾植芳赴京省亲，李说郭邀你某日去家里喝茶，贾说，郭如今已是政务院副总理，我去未免觉得唐突。李却说，都是留日同学，没关系的。到约定那天，恰逢下雨，贾雇了辆三轮车拉到缸瓦市某胡同五号，朱漆大门，有警卫把守。贾被引进宽敞的客厅，只见正面案几上放着一座很大的毛主席塑像，这在当时还极为罕见。郭一见贾，热情有加，说：还记得我们在新人乡酒馆吃饭的事吗？那时他住在千叶，经济很是窘迫，仅靠一点翻译稿酬维持，衣服又窄又旧，为了与朋友聚会，他冒雨从千叶赶来，也可以说是情深谊长了。那天，郭还深有感触地对贾说，有低头的一天，才会有抬头的一天。象是在对过去那段历史做总结，也象是在向友人传道授业。席间，天南地北、创作翻译，无所顾忌，畅谈甚欢。临别，郭一直送到大门口，频频挥手间还一再对贾表示：“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去看你。”

还有下回吗？历史回答说：没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胡风和他的分子们一个个倒下，在这场古今少见的冤案中，一马当先的首推郭沫若，他连续发表高调批判文章且不说，在批判大会上第一个冠以“反革命集团”称号的正是此公，第一个提出对胡风“必须镇压”的也是此公。后来的表现如今许多人都已经比较清楚了，

比如文革刚刚开始就表示要烧光自己的全部作品啦，两个儿子遭难，做父亲的为了“革命利益”不问不闻以至一命呜呼啦……这中间还有个故事：据说文革前夕，毛曾对郭说想问他借样东西。郭说，凡我有的，主席要，都应该献给主席。毛说：借个脑袋。郭一听，啪地一声就跪到了伟人脚下。当然这或许只是小民编的“世说新语”，不过倒也可一窥民心所向。至于他那写李白杜甫的献媚大作，为歌颂“百花齐放”而精心制作的百首咏花诗，伟人手书《长征》中多写了一个“铁”字却硬说此处重复非常必要，还有反秦（始皇）又颂秦的那幕大戏，以及他不断东倒西歪、卖身投靠的种种恶行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肉麻吹捧，更早已被众人嗤之以鼻了。贾先生讲了好多郭的故事，言语间他非常钦佩郭的学问包括他的智慧和超强的记忆力，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先生看不起郭，他说，还是鲁迅的评价公道：才子加流氓。

## （二）

要说人性如何堕入暗夜，以上讲的可能还不够典型。那就说说第二位：贾植芳先生亲哥哥的夫人、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李大钊牺牲后，胡适为之修坟，周作人收养了他的后代，女儿李星华后来嫁给了贾芝，贾芝去了延安后，受哥哥之托，如何把她以及她的儿子和弟弟从北京秘密送到延安，成为这个做小叔的一件大事。贾植芳说，虽然周作人做了“人保”，但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非常麻烦，一个是钱，没有相当数量的大洋，这件事难办；另一个更难办的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就难以保证。我想，先生在这里有意淡化了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极大的危险。可是他办妥了，他找了人找了车，临走，从西安去延安时，还把自己所有的150块大洋全给了这位嫂子。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延安我只认识一个人，毛润之，代问个好吧。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究竟带到这个问候没有。先生说，大概没有。因为她刚到延安，那里就开始批判丁玲王实味，同时声讨周作人，浓烈的火药味让这个年轻女孩经受了巨大的刺激，哪里有胆量再去晋见毛主席！

历史翻过一页。

1955年的胡风罪案顷刻间毁了贾植芳安定没几年的家（他1948年刚走出国民党监狱），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五日，他便锒铛入狱，妻子任敏不久也被扫地出门（当时，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提出口号，要创设“五无城市”，即把地富反坏右统统赶出上海），“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山村当了小学教员，可没多久又以为反革命丈夫“翻案”的罪名把她投入大牢，在遭受三年多物质上巨大的艰难和精神上巨大的困顿之后，正是青海因饥饿而大批死人的时候，她被告知“自谋出路”而放出了监狱，但规定两条：一，随叫随到；二，不准回上海。

一个从偏远大山里走来的这位四十来岁的女子，往何处去？丈夫还不知在哪里，更不知是死是活，茫茫人海，她想到了只有一个去处：早已在京城做干部的贾植芳的哥哥和嫂嫂。可是，当她跋涉千里找上门时，却被那位已经彻底革命化的嫂子好一顿训：你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李星华态度坚决，不能收留！贾芝总算表示先安顿下来再说。于是任敏就在贾府做佣人一般每日里默默地洗衣拖地，女主人还规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给他们坏影响……

这个情况很快被一位叫李丰年的“麻袋铺老板”得知。他立马冲进贾府，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让你受这个罪，凭什么？那态度不容你商量犹豫。这个老李是何许人？闲聊中我常听先生说到这个名字，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感激。原来，老李同先生是一个村的人，先生称呼他“伯伯”，他家境贫穷，小时候常提着个篮子卖五香豆，后来跟着村里人到北京学生意，他聪明伶俐又勤奋好学，很快就自己当上了老板，到三十年代，贾芝兄弟俩由在外经商的伯父出资到北京读书时，就是由这老板经管一切费用的，两人逢年过节不回老家，就到这麻袋店来“混”饭，一二·九运动那时节，贾植芳被捕的消息还是李老板告诉了他伯父，并且捅路子出钱，才把他救了出来，从此流亡兼读书东渡扶桑。

怎么能料到，将近三十年后，又是这个李老板把任敏送到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呢？（讲到这里，先生加了一句：这个老板有人性！）就在那个遥远偏僻的小山村里，她种地养羊织布，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直到丈夫彻底平反，这对“牛鬼织女”（贾植芳语）才又相逢团聚。

历史再翻过一页。1986年，少小离家的兄弟俩回到老家，找到了任敏当年住的屋子，那是在牲口棚里隔出来的一间，潮湿而阴冷，难挡风雨难避寒暑，哥俩的眼圈有点红了。后来，贾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请弟弟两口，任敏不去，丈夫一再规劝才勉强同意，可她只是端坐着，没说一句话，没动一下筷子。

当然，尽管兄弟俩的人生轨迹并不一致，但毕竟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他们有时走得比较近，有时则相隔比较远。五十年代初期，从延安回北京的贾芝就在文学研究所任职，他对日益升温的批判胡风的运动自然特别关注。1954年，弟弟赴京省亲，做哥哥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谈，可他了解弟弟的倔脾性，怕自己的劝说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一天中午，约请来了文研所的头儿何其芳等，一进门，何就热情地同贾植芳握手，说：“老弟，我们正要找你好好谈谈呢。”贾植芳常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听这话立即警觉起来。接着，何就说了胡风的四个错误，“你是胡风的朋友，应该帮帮他。”没想到贾植芳从如何认识胡风讲到胡风怎样同国民党政府斗争，最后明确表示，你所说的四条，我一条也看不出来。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哥哥一看情况不妙就悄悄地走了出去。多少年后，先生说，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付出悲惨的代价。

正是这样。不到一年，贾植芳被投进了大牢。他哥哥知道后就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后由他照顾，并且陆续寄来了一些营养食品，还有《红岩》等书籍。在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没有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一次次施以援手，这是他们弟兄关系得以持续的根本缘由。一直到晚年，哥哥还给弟弟送来一件高级红色外套。先生始终没穿，他半开玩笑地说，一辈子说我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勾当，不能穿的。可他帽子却一直戴着，有时忘了，就会笑着说，我的帽子呢？帽子戴惯了，不能丢。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也可见出兄弟俩之不同。那是嫂子去世，先生陪他哥哥去料理后事，车到八宝山，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后勤部门负责人转过头来，问：骨灰盒，买多少钱的？答：选最好的吧。少顷，回来报告说：上面有规定，司局级的只能买78元的，部级以上才能买200的。贾植芳觉得有点滑稽，不禁脱口说道：我死了，买个三块钱的就行。他哥瞟了弟弟一眼，说，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 （三）

接下来，自然不能不说到朋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让我刻骨铭心：“出卖不出卖朋友，难道还需要费心去选择吗？”他这里说的朋友是专指胡风，可这也是他做人的底线。1947年在国民党监狱里，1955年在共产党监狱里，都有人劝他揭发胡风，先生的态度是：“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正因为如此，他也就特别看不起那些“奴在心者”的小人，他说，他们的官做得再大，我看不起他们。

遗憾的是这样的小人如今还真不少。我以前在文章里记述过一些，都是先生一次次讲的，有名的如舒芜以交出私人信件卖身（不过他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刘白羽前脚还在同胡风碰杯，后脚就领着便衣捉拿胡风；又比如，大学某教授，昨日有难求人帮忙得免自寻之悲剧，今日投靠成功却一阔脸就变，与恩人怒目相向；还有的，到家里来象个朋友，“抽我的烟喝我的酒，背地里记我的账，说贾植芳阴魂不散，甚至连我的学生也不放过”……这么多故事听下来，我也慢慢悟出了点道道，凡是做了官的或因各种原因而春风得意的，往往就有可能自觉地或者不知不觉地让功利（需要特别点明的是，这“功利”二字挂的是堂而皇之的牌子，叫做“国家利益”或者“革命名义”或者“党的原则”等等，伟人把它叫做“革命的功利主义”）压倒了性情。常说某人是性情中人，那此人多半重感情重信义，如果知识分子踏入官场，他要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操守，那一定倍受煎熬，否则只有同流合污，小而失人格，大而失人性。这些道理我说不出来，是先生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提出让王元化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也曾是“分子”，他找到贾植芳。贾听完他的话，慢悠悠地说：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依我之见，你这部长怕当不长。真可谓高瞻远瞩，真知灼见！一年多，元化先生体面地下来了。这一年多，他脑子里的“原则”和“性情”肯定打了不知多少回架，最后，他的“学者”角色胜利了，他的下台成就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根本无须有丝毫内疚，我们肯定他的这一明智选择，并非是因之使他在学术界留名青史，而是他为护卫人类良知和正义添加了亮丽的一笔。在此，我想套用我曾赞美贾老的一句话：部长很多，王元化只有一个！

于是不由想起另一位“宣传部长”陈沂。陈将军在1957那场“阳谋”中有幸也做了回“分子”。后来在上海主管意识形态时，文艺界的人都跟他比较亲，黄宗英他们都叫他“陈大哥”，认为他受过冤屈挨过整，对大家一定更容易理解容易接近。没想到，这位部长根本不顾什么友情亲情，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用当时有位作家的话说，他是“生命诚可贵，同志价更高，若为政治故，两者皆可抛。”赵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部长看了，大为不满：“放屁！”传到阿丹那里，又紧张又气愤，后来有几部影片也不让他出演主角，以至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开全国文代会，陈沂是市委的头儿，安排他住的房子比上海代表团团长茹志鹃、副团长王元化都高级，可没人搭理他，吃过晚饭没地方去，只有到隔壁贾植芳那里闲坐。贾说，他又不抽烟，我们只是四目相对。陈或许是有点受不了这种冷落了，便问贾：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现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啥？贾不好回答，便说，小组开会时，问问大家吧。于是引出了黄宗英的一席话，大意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头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让下面人打的？这么一想，应该就明白了。先生说，其实，最要命的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21

#### （四）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亲人、朋友、同事、师生，怎么转眼之间会“老母鸡变鸭”了呢？秘密恐怕就在一次次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让所有的人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高于一切！人们不断地觉悟到：昔日之同志（亲人、朋友等）可能就是今日之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革命，应该揭发批判乃至打倒那些敌人，温良恭俭让是决不容许的，除非你准备把自己也搭进去。看看老大哥那边的情况就洞若观火了：十月革命之初，托洛茨基坚决支持列宁，狂热鼓吹暴力鼓吹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整肃屠杀了多少无辜；1924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大反托洛茨基，成功接班；1938年，斯大林回过头来杀了季诺维也夫，同时把所有他认为的异己送进了地狱。什么罪名？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同志就是敌人”：无产阶级革命征程中充满了多少这种血腥的历史真实！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平常的革命真理，托洛茨基是直到他被驱逐出祖国时才明白的，当然还有更不清醒的，直到脑袋掉了还在山呼万岁：变了味的革命把多少人变成了痴呆或准痴呆和半痴呆！用老共产党员张劲夫总结出来的一句话：那是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他晚年认为这是共干性格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革命同志”面对重大抉择时，都会自觉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能在组织上犯错误。

问题或许还应该看到另一面：一个人，一旦做了官，他的“心”就冷了，这难道完全是“洗脑”的结果吗？这里恐怕还有个利益问题：跟我走，“你有我有啥都有”。你吃革命的饭，身后是档案、户口，过去还有粮票布票等等，不要说你根本不可能“解甲归田”，你和你全家（甚至亲戚朋友）的身家性命都不在自己手里，你有本事去学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人身依附发展为人格依附几乎是一种必然。我想，除了那些已经喝足了狼奶而异化为非人，文人本色全无，文人味道尽失，人性早已堕入暗夜的以外（他们做的有的甚至比他们的主子还要狠毒），无论如何，文人总还有文人的特色，只要人性未泯，还不致于做出太伤天害理的事，许多做了官的文人说些无情的话做些无义的事，或许也是因为“身在江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现在要问的是：是什么魔力让那么多人违心？他们

用“无奈”二字就可以把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了吗？只是半个多世纪，怎么就把那么多文人的“根”弄没了？甚至让整个民族患上了“臣妾心理综合症”？而贾植芳四进四出监狱，为什么他就能不认罪不揭发不检讨？

我不禁又有点糊涂起来了。我只记得先生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看一个人，主要看他有没有人性。当先生讲到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时，甚至说出这样的狠话：他们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回到本文开头，先生何以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有特别的亲切感？这或许是他人生经历的历史总结，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感人的天性和人性，他们较少名利负担，他们真诚而不做作，他们义不受辱，他们向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他们决不甘心情愿做什么工具或喉舌，他们即使被打翻在地，精神境界也非那些打手可比，用先生的话说：我就是倒在地上，也比他们站着高……人啊，人！

【转载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刊《民间历史》】

## 沉重的回忆

王桐初

**前言：**夹边沟在我的记忆中已存在 53 年了。1957 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当时宣扬的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处理。1958 年四月底，父亲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甘肃省当时的第一书记张仲良、甘肃省地质局当时的领导丛健、李云龙、白智斌、高汉瑾等人的关怀下，送去夹边沟进行思想改造。不到三年，1960 年大约是 11 月（具体日期不详）就彻底改造好了。原本健康的身体脱胎换骨成了一堆白骨，他的灵魂升入了天堂。然而这个改造人的圣地，我却无缘前往景仰。只从一些媒体得知此地现已成为休闲度假村。但 50 多年前已改造成白骨的成千荒冢仍然半隐半现在荒丘沙海里。据说每当深夜还可听到乱葬岗中冤魂凄声哀诉，此时可能也是度假村中人们杯盘交错酒酣耳热之时。如此两种情景交相辉映，不知他们感觉如何？我衷心祝愿沙漠不再贫脊，那里生活的居民在成千英灵荫佑下生活幸福。夹边沟这个地名已深深的刻在我心的深处，伴我终生。

22

### （一）父亲的经历

我家祖居湖南长沙市。曾祖父一生任教于长沙岳麓书院，祖父则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一间中学（原名建国中学）及一间小学（原名群英小学），专心从事教育事业。1952 年两校均已交归国有。父亲名王本莪，不满 13 岁时，我的祖母就去世了。虽然在生活上不缺吃少穿，但过早的失去母爱，少年时代是不幸的。他读书认真，从湖南较有名的省立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大南迁长沙，后又西迁昆明，与清华、南开三校合并称为西南联合大学。父亲约在 1938 年从该校毕业。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广西八步（现称贺州）一矿务局工作（好象称江华矿务局）。1943 年春，父亲回到了湖南宁乡，应聘在宁乡的几所中学任教，直至 1946 年夏。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夏，父亲从当时的“中央日报”上看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从重庆迁回南京，便立即致信测勘处处长谢家荣先生（谢先生是父亲在北大时的恩师，现中科院院士谢学锦先生的父亲），表示愿意回本专业工作。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于是父亲即赴南京，从此就开始了他的地质探矿专业本行工作。

父亲只身前往南京，我和母亲及妹妹三人仍居住在宁乡的大家庭中。父亲工作单位是“南京高楼门峨嵋路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父亲在此工作至 1948 年春，后调往湖南新化锡矿山任钻探队长。

此时，解放战争已打得火热，他与我们两地分居，放心不下，到任安顿下来就立刻回宁乡将我们母女三人接到了锡矿山与之团聚。在这群山峻岭交通不便（当时还不通公路）的矿山里，在战火纷飞之时，确实像世外桃源。在锡矿山工作到 1949 年 8 月，湖南和平解放，父亲作为旧技术人员随即调

往长沙的学习班集训。大约当年的11月分配在当时的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工作。

大约1950年10月，父亲调往新组建的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地质调查所钻探总队，任命为钻探总队副总队长。当时武汉市为中南区行政中心，父亲前往任职，我们全家也随迁至武汉。1950~1956年，由于机构多次调整，（如撤大区重工业部建大区地质局，探矿队也改撤多次）父亲的工作也经常变动，曾前后去过湖北大冶铁山担任过钻工培训学校的副校长，在湖南常宁及临湘、河南平顶山等地探矿队工作过。后又调回到中南地质局探矿处任职。

1956年四月，父亲自愿去支援西北。去到当时西安的西北地质局。不久西北局搬至兰州。随后又撤大区局，建省局。父亲就属甘肃地质局了。在甘肃局工作仅仅一年，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1958年四月遣送夹边沟，仅两年多时间就因饥饿劳累而死亡，走完了他47年的人生之路。。

## （二）1957~1960 家庭的遭遇及我的经历

1955年我在武汉高中毕业，考入五年学制的天津大学。我妹妹也于同年升入当时武汉较好的华中师范学院附中的高中。1956年四月父亲调往西北，母亲随行，妹妹仍留在了武汉住宿在学校。1956年暑假，我和妹妹回到兰州与父母度过了一个欢乐温欣的假期。当时兰州风沙比较大，父母住的地质局宿舍是筒子楼中约12平方的一间房，煮饭就在走廊过道上。大院内还没有自来水，用水是在院内汲井水。井水很黄，需沉澱后才能使用。一桶水可沉下约5厘米厚的黄泥。我当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从条件较好的武汉来到西北。父亲说：西北矿藏丰富，将来发展会很好的。他还想让妹妹转学到兰州。妹妹认为在武汉已习惯了，不愿离开已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后来家庭的变故真庆幸妹妹未转学到兰州。1957年暑假，我们再次回到兰州时，我家已搬入两间平房。已经开始反右了。至七月下旬，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已贴满了地质局大院，甚至贴到了我家房门上。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左邻右舍的人见到我们都不理睬，侧身而过。父亲也不让我和妹妹走出家门。他每天回来从不谈及他被批斗之事，我们也就不甚了解批斗的内容，只是看到贴在房门及门旁墙上的大字报，尽是口号式的内容，如“王XX不低头就自取灭亡”，“彻底揭露王XX的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面目”……如此等等。八月初，大学也开始开展反右，学校来信让回校参加运动，我只得离家返校。离家的那一刻，我一直没有忘记，父亲满脸憔悴的半躺在旧藤椅上，伸出右手握住了我的手，我长到19岁，这是父亲第一次这样庄重的和我握手。忧郁的眼神望看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能去车站送你了”。谁能料到，这次离别竟成永诀。1957年寒假之前，父亲给我写信，让我去武汉看妹妹，并嘱咐我们都不必回兰州，我想父亲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处境。1958年暑假及寒假我和妹妹已无旅费返家。

23

1958年四月父亲遣送夹边沟后，我母亲及年高多病双目接近失明的祖父（祖父是57年初从湖南接到兰州的）被甘肃地质局收回宿舍，扫地出门。母亲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住处，生活成了问题。当时一人挨整，株连全家，置人于死地。祖父承受不了这一打击，也不想拖累母亲，就自缢身亡了。母亲拖着瘦弱的身躯，只身忙完祖父的后事，坚强的母亲当时并没有将这一切告之父亲和我们俩姐妹，她一人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

之前有些交往的一位湖南同乡，也是王家祖上的远亲（原是二野的军人，进军兰州后随即转业定居兰州了），好心收留了我母亲，才没有流落街头。一段时间后，这位亲戚费尽周折介绍我母亲去一街道办的油毡厂做临时工，每月工资25元，虽然工作很苦，总算有了收入，白天做工，下班后仍寄居在这位同乡家，总算没有风餐露宿。

1958年四月父亲离家时给我和妹妹寄了最后一次生活费，母亲随后一次又一次将家中物品出卖，最后只余下了她自己盖的一套旧棉被及几件破旧的换洗衣服了。但是母亲在给定的信中总是说：她有了工作，生活还过得去。

1958年夏，妹妹在武汉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成绩优秀，但没有学校录取，后在他班主任的奔走下，在录取工作已接近尾声时，才被录取到原是一所大专58年升格为本科院校的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轧钢专业。当年大学虽不收学费，母亲要承担我俩的生活费，显然是不可能的，家中



也已无物可卖了。这时有几位好心人在经济上给予了我们帮助，他们是：一位是在武汉工作的堂兄，另三位是父亲在武汉工作时的部属，当年收入都不高，但他们却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那唯恐招来横祸的年代，他们没有回避。他们这种情操我一直珍藏在心，遗憾的是现在健在的就只有我年过八旬的堂兄了，其他三人都已作古。在他们好心的支援下，又过了一年。

1959年四月，我接到兰州那位亲戚的信，告知我母亲重病，全身浮肿，我再也无法坚持学业，立即办了休学手续，回到了兰州。到兰州后，我才知道父亲走后家中所发生的一切。我急需找一份工作，解决困境。在寻找工作的路途上，巧遇已毕业分配在兰州工作的大学校友（她也是我在武汉高中时先我两年毕业的校友），她认识当时甘肃省轻工业学校的校长，该校正缺教机械制图课的教师，经她介绍，这位刘姓校长并未因我父亲的问题而拒绝，当时就答应了，并马上让办公室一位王姓主任给我填写了干部聘用登记表，还说我不必填上父亲的右派问题，以免麻烦，这事他知道就行了。王主任也说要让我过两天去办正式手续。两天后，我去报到，王主任告诉我：五年大学我还未读完四年，按大专毕业试用期待遇，每月48元，马上可以去财务室领取本月工资了。他问我住在何处？我向他谈了母亲和我是寄居在亲戚家。约一周之后，王主任说：学校住房紧张，现在女生住的宿舍单元内，可腾出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原为厨房约9平方），你家暂无男性，住女生宿舍区，也不会感觉不便。问我意见如何？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感激。我和母亲总算有了安身之处，虽收入微薄，每月寄给妹妹15元，当时除每月购买按定量勉强裹腹的粮食及少得可怜的食用油外，其他也没有什么可买，因此余下的钱已可维持我们母女俩的生活。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人。母亲的身体已不能再去油毡厂做工，便在家休息，身体状况较好时，力所能及帮人缝缝补补做点手工，每月还得接济在夹边沟的父亲几元零用。1959年11月，我深知我已无望复学，便申请退学，学校批准了，并寄来一纸“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的证书。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这纸退学证我保留至今，也算是我人生转折的一个见证。

也真是巧合，我工作的轻校，前门是当时的团结新村一号，我搬入宿舍后，才知道该校后门正巧与甘肃地质局仅一街之隔，且我住房的窗口与那扇我曾经进出过的地质局大门隔街相望。我那两个假期回家时虽与父亲当年的同事及邻居交往很少，但1956年第一次回家我从天津带回去的干鲜大虾及其他海味，天津麻花，母亲分送左邻右舍时情景。笑脸相迎，气氛融洽。1957年反右了，左邻右舍见我们则冷眼相对，路经家门也快步而过。这些邻居的面容我多少还有记忆。尤其是那些来我家门口贴大字报的人，记忆深刻。现在偶尔在窗口看到这些面孔，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尤其见到当年拿着大字报气势汹汹来家门口张贴的熟悉面孔，联想到他们趾高气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这些作为，心中气愤难平。可冷静下来，也可理解。人都有追求，踏实做事，难以有成。即是有成，又能如何？当年不是有不少文化名人及专家学者沦为右派，实在风险太大。而紧跟形势，喊喊叫叫，费力较少，即可保全自己，有的还可从混水中得利，甚至平步青云，何乐而不为呢？有一件事我至今尚未忘记，1960年10月当时兰州市物资已经奇缺，副食商店柜台中除了摆放像砖头一样的酱油糕之外，已别无它物，居民已是饥饿难忍，抢劫之事随之增多，有一天我去离学校不远的邮局寄信，当我急步超过走在我前面步履蹒跚的老妇人约不到三米时，就从我身后传来了哀叫声，我转身看到有一个身体瘦小的孩子抢了那位老妇人手中的布袋，在争抢中老妇已跌倒在地，孩子站着发呆，我走近一看，孩子骨瘦如柴，从他抢到袋子还没跑开，一脸稚气惶恐不安的表情看，年龄可能不足10岁。躺在地上的老妇，我认出她就是我家原住地质局宿舍时一墙之隔的邻居。我为难了，抢劫固然不对，但孩子实在可怜，我不想去责备，而那位老妇，从年龄来说是祖母辈了，老人与我并无芥蒂，但我也不能相帮，更不能相认，因为我的身份所限。三年前她家就与我家划清了界限，如我帮她害怕好事者认为我们之间又有勾搭，而给她已站稳立场的家人惹来麻烦，因为在那年代黑白颠倒的事太多了。我稍犹豫就走开了，视而不见。但心中却五味杂陈。我真不知我这种做法是可耻？可怜？还是可悲？……

在轻校工作一年后，1960年秋开学时，轻校换了新校长，新校长也姓刘（刘廷富），但“此刘”却非“彼刘”，他对出身于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及旧政权留用人员一律排斥。有了解内情的教职员说



此刘是使用不当手段取得校长职位的。1960年10月兰州刮起了下放风，我们这些“贱民”自然就在劫难逃了。第一榜全是老弱病残，我荣登第二榜，在大红的光荣榜上开头写着：热烈祝贺下列同志光荣去到甘南草原锻炼。是否“光荣”？大家心知肚明。第一榜中的老者残者有人连起床都困难了，真不知如何“锻炼”？我当时的情况是母亲。还病着，我走了她怎么办？

我中学时代的密友，她1958年从武汉大学三年学制的图书馆专业毕业分配在广西南宁工作，并与在南宁市委工作的男友结了婚。1959年我休学回兰州后，他俩很同情我的处境，她丈夫便介绍了他在市委的一位同事（也是他的好友）与我交往，兰州——南宁相距几千里，当时没有条件见面，仅是互寄照片相识，所说“交往”也只是两地书信坦诚交流。当我得知要下放时，便去信告诉他们，很快就收到他们回复的电报，并电汇了旅费，让我带着母亲南下南宁。我犹豫了，我们去到南宁怎么办？我与“他”仅是照片相识及书信交流，见面后会怎么样？即使俩相情愿，他是党员，又是市委干部，婚姻是需经组织审查批准的，我这样的家庭能行吗？这时我女友又来电了，让我不必顾虑，先将母亲送到她那儿，即使其他事情不能解决，老人就由他们夫妇照顾了。于是我立即去车站购票，谁知车站已是人山人海，一片混乱，无法购到车票，有不少手持车票的人，也无法进入车站，挤不上火车。我只得找到兰州铁道学院工作的大学校友帮忙，他们有人熟识兰州车站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购到车票，也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和母亲顺利的上了兰州开往北京的那列火车。火车上拥挤的情况，与现在影视片中看到的抗战时逃难的景象有过之无不及。在车内很难动弹，也无食品及水供应，好不容易熬到郑州，转乘北京——凭祥的国际特快，郑州至长沙段，人还较多，车过衡阳，人就少了，过了桂林，车箱内几乎快空了。列车员说：任坐任睡，你们可随便。车上也有食物供应，只是价格较贵。在兰州我母女已忍饥挨饿多时，更不可能见到鸡鸭猪肉及鸡蛋了，在车上总算饱餐了两顿，其情景我几十年来仍未忘却。

我记得11月20日晚上约9时火车到达南宁站，站台上人很少，从车窗中我就看到了女友两夫妇和“他”三人。我怀着忐忑复杂的心情下了火车，不知此行能否让我能走出绝境。在我未到南宁之前，男友已向他的领导监委书记谈过我的情况。我们见面相处几天后，彼此都认可了对方，就向他的领导写了报告，请求批准结婚。监委书记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他叫我去当面谈话，我见到的是一位和蔼的老人，他详细的问到了我的家庭，我父亲和我的情况。他沉思了片刻，便说：你父亲属高级知识份子，划右与你无关，他是他，你是你么。随即在我们的申请书上签名同意。我们也没做什么筹备，第二天就去医院婚检，1960年12月7日，只告知丈夫单位交往较多的同事及他从武汉来南宁工作时一同南下的好友，婚礼简简单单，我们就结婚了。此后诸如为解决两地分居与兰州商调来南宁，户口登记，我在南宁的工作安排等等，都很顺利，至此我和母亲终于结束了几年的厄运，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了。

从1960年9月至11月我离开兰州之前，就没有收到过我父亲的信。在兰州上火车南下之前我去信夹边沟，告诉他我女友在南宁的地址，我结婚后又马上去信，告知我和母亲都已在南宁以及详细地址。但直到1961年1月底，我和在武汉的妹妹都未收到过父亲的信。我和丈夫商量后，他建议我找我工作的单位党委谈谈，能否以单位名义去信甘肃地质局询问。我的单位答应了。约过了半月，党委书记通知我去党委办公室，在场的有人事科长及党委书记，秘书将甘肃地质局回函拿给我看，上面几行字：“王本葵已于1960年11月在夹边沟病亡，其遗物现在我局，家属是否来取或按家庭地址寄回。请转告其家属。函复。”当时我差点抑制不住我的情绪，党委书记当场的谈话很坦诚：“人已不在了，遗骨也不在兰州，去到夹边沟也未必能找到埋葬的确切地点，当地风沙迷漫，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你孤单一女姓，路途多有不便，如去兰州，除了领取到遗物，也不会了解到其他，往返花费，旅途劳累，有否必要。这只是我的看法，你可与爱人商量决定。人事科长在这里，如果你决定去，可找他办理请假手续。”我与丈夫商量时，他也认为党委书记的谈话正确，我便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告诉甘肃局我的地址。过了约20天，遗物寄来了，打开一看，惨不忍睹，几件破烂得已无法形容的衣服，肮脏不堪，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父亲已故的恶耗还没有告诉母亲，因几个月已无来信，其实母亲心中

已经有数，只是不愿表露而已。现在这样的遗物哪敢让母亲看见，我剪下破衣服上快要脱落的几颗纽扣包好，留作纪念，破烂衣服只好封好收藏起来。我的心情悲愤极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里，这情景会时常浮现在眼前。我是学工科的，对诗词是外行。退休之后，有了空闲，才开始翻阅唐诗宋词。在怀念父亲时，为表达心中情感，就摹仿字数少的词和诗写下心里话。

### 仿（诉衷情）悼念父亲

当年不恋黄鹤楼，怀志赴兰州。荒原钻塔耸立，夙愿化宏图。

阴云起，志未酬，业已休。奇冤难料，饥逝巴丹，遗骨沙州。

（巴丹：酒泉吉林巴丹沙漠）

父亲去世之事，不可能长期瞒着母亲。当我们委婉的将了解到父亲已去世的过程告诉她时，她平静的问到：“信在那儿？”我说是单位之间的信函，不能交我们保管。母亲表面平静，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母亲到南宁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市委大院内邻居老人们也相处融洽，身体已不浮肿，精神也好了很多，也常和老人们说笑。而此后却独处时间多了，整夜失眠，不久就常说腰痛背痛，我和丈夫先后陪母亲去南宁市及自治区级医院诊治，医生们都认为是脊椎增生引起疼痛，母亲也说在油毡厂时因搬重物扭伤过腰，治疗后症状也确有减轻。谁知1966年春节后腰背疼痛又发作，西医中医任何治疗均无效，病情发展极快，5月初已不能下地，广西医科大学附院的诊断也已明确是脊柱癌，已是晚期，脊椎一节一节已有错位，任何治疗都无力回天，只能尽量止痛减少痛苦。母亲在病床上瘫痪躺了将近7个月，于1966年11月25日去世。享年仅52岁。她与我父亲1958年分别时是44岁，两人都还是中年。当时南宁刚实行火化，母亲遗体火化后骨灰寄存在殡仪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及诸多其他原因，直到2003年11月母亲去世37年后才在南宁烈士陵园的公墓区购置一方墓地下葬。因父亲遗骨远在酒泉，为表示父母同葬，墓碑上有父母合影及并排刻有父母英名，母亲骨灰缸中放入一帧父亲遗照，将原封好的父亲那些遗物也放入墓穴，此情此景我感慨万千。我写下了几句心里话：

慈父蒙冤逝酒泉，母逝邕城两分离。

双亲同穴难如愿，墓中仅是影相依。

七十年前燃红烛，聚少离多年复年。

壮年一别成千古，英魂天国定团圆。

（因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父母聚少离多）

### （三）父亲的为人和品格（右图为父亲遗像）

父亲的为人是正直善良的。他嫉恶如仇，洁身自重，不结交权贵，他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及组织。在他的思想里也没有阶级的概念，只有人品的区分。也不懂官场潜规则，也看不惯灯红酒绿，杯盘交错，巴结逢迎的场面。只渴望在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环境里尽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干点实事。

父亲的这种性格，致使他的朋友多是过去的同窗好友，一般平民，探矿队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工人。他与政要很少往来，单位领导即使相邻而居，也极少主动登门。记得解放初期，长沙警备区负责人中有一位是他在北大时的学友，后弃学去了延安，1950年长沙大街上警备区的布告上署名的领导人中有他大名。据父亲说：“一二九”学运时，此人是学生首领之一。为躲避军警追捕，曾躲进我父亲及其他人住的公寓，当时他们相处还不错。1950年得知他已是军政首长，父亲却没有去找过他。父亲说：“彼一时，此一时，何必呢？”

父亲在宁乡教书的那段时间，农村中的春种秋收，只要父亲在家总常去乡邻家田里与他们一起劳



动，尽管动作笨拙，引起一片笑声，但拉近了与乡邻的距离。平时乡邻家有事，他能帮忙的，也很主动。他当时所教的学生，也有不少是乡邻子弟。与当地乡邻建立了深厚的友情。2002年11月已离宁乡半个多世纪年过六旬的我，受仍居住在宁乡的两堂兄的邀约，在老伴和儿子的陪同下，故地重游，那些比我年长尚健在的乡邻热情的接待了我。谈到我父亲，老人们唏嘘着：“好人啊，如果送回这里，决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他们用我已不能完整听懂的乡音描述着父亲当年的言行（堂兄充当翻译）。父亲当年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应对国民党的拉夫征丁；用自己当教师的薪金帮助贫困乡邻孩子的学业；过年过节及祭祀时帮他们书写对联及祭祀文字；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组织乡邻举办庆祝活动。如此等等，乡邻们一一道出。我真想不到父亲在这些当年正当青年的心目中竟还留下了如此深刻和清晰的记忆。我那时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有不少事情是我不曾知晓的。乡邻们这些发自内心的赞誉使我感动，也使我对我父亲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世事沧桑，山乡巨变，旧貌不复存在，村庄已换新容。我衷心祝愿乡邻生活幸福。也觉自己不虚此行。

父亲与探矿队的职工也能打成一片，职工有困难，只要自己能解决的，就立即解决。在基层探矿队，因父亲平易近人，也就有职工毫无顾及的向父亲借钱借物，父亲则慷慨的回应，钱物在宿舍内某处，让需要的人自己去取，因而有时谁向他借过钱物，借出去多少，他都忘记了，当借钱物的人归还时，父亲甚至想不起来。他的衣物别人拿去穿用，他从不计较。我曾听母亲说过：有时出差回来，清洗衣物，发现少了。父亲的答复是“不记得谁拿去了。”即使是只有两件衬衣，别人穿走一件，自己不能换洗，也无所谓。正因为父亲在武汉工作的几年中与普通职工有真挚的情谊，在父亲遭难，我家陷入困境时，有良知的几位职工就冒着风险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父亲热爱自己的专业，为了事业他不怕艰苦。如1947年四月，为勘探西沙群岛的磷矿资源，当时的资源勘测处派人前往时，西沙遥远，海浪涛涛，路途艰险，多数人都有些畏惧，不想前往。父亲去了。当年父亲还将在去西沙群岛的军舰上照的一帧照片寄给了我们。去年我偶尔在网上搜索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民国档案”1992年第二期中有一篇关于1947年去西沙勘测的文章，我立即发去电子邮件联系，请求将刊物寄一份给我。回电说明此刊发行时期已久，无法整本寄出，但可复印其中某些部份寄给我，南京档案馆的同志很热心，不久我就收到了此文，并附有当年测勘处西沙堪察规划，尤其珍贵的是还有我父亲署名的几千字的勘察报告，这是我能看到的父亲留下的唯一的文字了。当我电话回复南京的好心人，告之文件收到，如何交付费用时，对方却说“不必了”。我真不知如何表达谢意。

1956年父亲本可以不去西北，留在武汉。当时地质部机构调整，又组建北方局及南方局，父亲也有机会去北京南方局，在武汉的中南局当时已调去好几个人，可父亲却认为去西北是最好的选择。西北，武汉，北京三地相比，哪里条件最差，最艰苦，不是一目了然吗？可父亲去了西北，由此可见他的追求。

父亲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去南京后工资收入不低，但当时物价也不稳定，父亲不善理财，除生活开支外，好心的同事帮他换成手饰等物。1948年春调锡矿山后，工资仍在南京发放，锡矿山另有津贴，这份津贴已足购我们一家的开支。这时物价已开始飞涨，南京方面的好友便将父亲的工资全部换成金饰，直到解放。这也是父亲唯一的积蓄了。1951年抗美援朝号召捐献，父亲便将所有手饰全部捐出，有朋友劝他应给两个女儿各留一两件，父亲的答复是“抗美援朝是大事。”不仅如此，后来又号召买建设公债，父亲又是倾囊而购，以致影响到家庭的生活开支了，母亲只好每天下午菜市闭市前去购买便宜菜。

还有一事，更能说明父亲对国家的热爱。记得是1948年秋，我们在锡矿山时，因为当年使用的是美国的探矿设备，来了一位维护设备的技师，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我称呼他“戴维斯”爷爷。在与他相处的几个月中，彼此越来越熟悉，原来是一位西餐厨师给他做饭，后来他愿意和我们一起吃中餐，我母亲也就常下厨给他做点菜，他很高兴。他向我们谈起了他的家庭：他唯一的儿子是抗日战争

时援华航空队的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牺牲了，儿媳妇已另外成家，有两个未成年的孙儿孙女和他老伴一起生活，他说和我们一家四口人在一起又让他重温了家庭的乐趣，父亲对他也很敬重。194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已风雨飘摇，他准备回国，他极力邀请我们一家同行，他一再说所需出国手续由他办理，到美国的费用及安家由他承担。他说：人老了，遇到我们一家感到特别幸运。父亲却委婉的回绝了戴维斯老人的好意，他不想离开充满了希望的祖国。1950年初，我们已经到了长沙，老人还通过有关途径寄来一封信，他已到香港等待，可父亲仍然没有动心，第二次又婉拒了。纵观父亲这一切，我不禁想说：他反党反人民吗？我还想问：父亲这样的选择是否错了？

从1949年11月至1956年四月这段时间，父亲的工作成绩是得到了肯定的。1953年3月和1956年调往西北之前两次评为全国地质系统先进工作者。1953年3月曾去到北京地质部参加会议，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总理还到会讲话。父亲在北京还购买了一本英、俄、德三种文字对照的外文词典，因为父亲原只通晓英文，解放后大都使用原苏联及原民主德国的设备，当时也来了原苏联的专家。为了方便工作，他还有自学这两种外语的计划，由此可见父亲对专业的执着和追求。现在还有父亲当年出席会议所用过的文件夹保存在我妹妹处，这是最好的佐证。我不禁又想问：到甘肃兰州仅仅一年，父亲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使人难以理解。

#### （四）1979年的兰州之行

自从1961年得到父亲的恶耗之后，一切似乎已经了结。以后十几年的动乱，更使人难以料想以后的情况。1976年10月之后，形势起了变化，人们见到了一线曙光。1979年初我见到了中央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文件。1979年5月我向工作单位请假与妹妹一同前往兰州甘肃省地质局了解对我父亲右派问题的处理情况。我最想知道的是：父亲当年是凭什么被划为极右的。

我们千里迢迢到达兰州之后，在处理父亲这一问题时，遭到局方的冷遇。时过20多年，1957年的领导早已不在其位，现任领导一则认为是给以前的领导擦屁股，并不热心。二则也是受当时大环境的制约，并不重视。具体负责接待的是局党办组织部一普通干部，口不离中央精神，也就是一份简单的“改正”结论，按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不补发处理期间被扣的工资；已故人员不开追悼会……也就是说尽量简单应付了事。我找到当时的局长，此人名马万里，没说几句话就官腔十足：“按中央精神办，你们不满意，愿意呆在这儿多久，请便……”一位乔姓局长，20多年前曾是父亲所在探矿处的处长，此人1957年我见过，当时他来过我家找过我父亲。在与他的谈话中，我理解他已年老力衰，而现在的位置仅是过度而已，在局领导层话语权不多，也许因在“文革”中也受到过冲击吧，感同身受，对我父亲之事表示了同情。

现在看看局方这份“改正”通知书中列出的父亲当年所鸣放的“右派言论”吧。

- （1）好像一说话就有人在后边听。记得有一次，一位工程师对我说：过去外国人讲话，中国人是一百个“也是”，现在仍然是一百个“也是”。当时我有同感，所以就答曰：都是中国人吗？！当然我没有把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分开是不对的。但就这句话，很快就被领导上知道了，给我开会，硬问我是什么思想。我想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为什么不让他有思想呢？有个思想就要问你个什么思想！
- （2）我在旧社会受过气，好像在新社会也受排挤。有些人在旧社会参加各种帮会，但只要对领导唯唯诺诺（别人谓之靠拢组织）就会飞黄腾达。我不知道现在还要阿谀（原文的错别字，应是谄）逢迎吗？
- （3）非党团员对党团员指挥不动。团员关继皋写了一个总结，因文理不通，我改了一下，就抱头痛哭。可是非党团员刘柱贤，我叫他写个报告，他就乐意接受了。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党团员。这不是“墙”是什么？
- （4）向工作队提意见，不经过书记，队长就行不通。四个局长我都感到难接近，官僚主义太多了。

以上据说是父亲在“整风”会上发言的原始记录。就凭这几条意见，就划成极右，将人整死，且殃及家人，我不能不为当时的局领导丛健之流汗颜。如此心胸，如此低水平也能领导本单位职工做好工作？不过其时这些小丑也只是充当了幕前的打手而已。当问及父亲当年的病况死亡的具体时间及遗体安葬情况时，局方推说全不知晓。但我从他们那闪烁的言谈中，猜测到全然不知是不可能的，出于某种原因，不好直说。

当我提出父亲当年还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而导致如此严重的处理？原始档案里是如何记载的？答复是：“文革”时局里的档案已全部丢失。我反向：这份“改正”结论中的几点父亲当年在整风会上的发言又是从何而来？难道这些当年的会议记录就没有丢失？在我犀利的言词下，对方只是沉默，他们理亏了，心虚了。

1957年以前甘肃局内与父亲相识的人在经历20多年的波折后，由于各种原因，留下的已很少了，我很难了解到对父亲当年的处理及去夹边沟后的具体情况，因我本身所承担的教学工作也不可能再呆在兰州浪费时间，消耗精力。当局方再一次找我商谈时，态度有所变化，勉强说了一番歉意的话。如：“你父亲的事，不仅是给你们家带来不幸，对局里来说，也是很大损失，局里也很缺如你父亲这样的优秀技术人员……”并提出如父亲有直系亲属需安置，局方可照顾安排。当年我大女儿即将高中毕业，我想即使考不上大学，也不会再来此地，甘肃地质局留下了两代人的遗恨（父亲和祖父）。这是我伤心之地，刻骨铭心。

关于经济补偿：据说是按当时中央精神，从1958年5月至1960年11月去世，两年多工资不补发；父亲被遣送后，需父亲供养的直系亲属所需生活费用不补发。父亲是正常病故（请注意“正常病故”），参照有关条例发其企业平均工资两个月丧葬补助，即 $80+80=160$ ，及内务部1955年几项优抚标准付病故抚恤费360，共计520元。以上是以文字形式付注在“改正”通知上的。最后付给1000元。局方认为是大发慈悲特殊照顾了。我当年不清楚我父亲每月工资的具体数额，但我想不会少于每月100元。两年多时间光从工资收入来说不止1000元吧！我家两条人命（父亲和祖父），我母亲因此忧郁而早逝；我中途辍学，所有这些是1000元能补偿的了吗？这笔帐算得出来吗？总之，1979年的兰州之行每个细节都深深的留在我心的深处，是无法忘却的。

父亲在夹边沟的情况，几十年来在我脑海中的疑问挥之不去，但又无法了解。2004年八月偶尔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看到一篇李姓记者采访作家杨显惠先生所著“夹边沟记事”的文章，文章中还附有夹边沟几帧照片。“夹边沟”总算有消息了。我的心情激动难平。立即想法在上海购到了“夹边沟记事”这本书，在书中虽没有找到有关我父亲的信息，但夹边沟当年的惨状已可说明一切。我又向“周刊”打听到杨先生的手机号，本想与他联系，但不久我就查出重病（膀胱癌），于是手术治疗等已无暇顾及联系一事了，家人也不想我因此增加烦恼，而影响治疗，将杨先生的手机号藏匿。我大病治愈，身体逐步恢复后，在互联网上特别关注有关夹边沟信息。2010年11月，网上一篇“夹边沟50年祭”又勾起了我想了解父亲当年情况的心愿，让家人找出杨先生的手机号，联系上杨先生后，他介绍了和女士，和女士给我寄来了她的作品“经历——我的1957”。她还介绍了其他的一些信息，使我对当年的情况有了些了解，有不少当年受难的人的家庭经历比我更苦。去年11月在我父亲遇难50周年祭时我填下了一首词，我不懂词的韵律，只是写下心里话而已。

#### 仿（水调歌头）夹边沟50年祭——纪念父亲遇难50周年

蒙冤莫须有，慈父遭酒泉。断壁残垣陋舍，栖身至何年？

沙漠荒原深处，风沙严寒酷暑，凌辱并艰辛。饥饿西归去，遗骨弃沙间。

五十年，常思念，夜难眠。

夹边荣变，车马喧阗度假村。荒冢冤魂谁慰？

劫后余生鬓秋。纠错遥无期。但愿人为本，期盼真和谐。。

最后,我衷心希望能有知晓我父亲在夹边沟情况的好心人能与我联系,谢谢!

王桐初:手机号:15078889767 电话:0771\_\_5321833 【交流文稿】

## 上海女人

杨显惠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炮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共安全专家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共安全专家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共安全专家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招工招右派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30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杆比骆驼草的茎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行。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

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

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

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

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带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

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

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议。董建议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

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议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议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

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议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议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捱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 and 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



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夹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摇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叫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啰，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档。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

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投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议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议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议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议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议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议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议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

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议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议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

她问董建议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议。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

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议。

我，是我找董建议。

蓦的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议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议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话。你是董建议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议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

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

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

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

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

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

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呢？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

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要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

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

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

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

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

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

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

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

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的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

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坟上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

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

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瞳瞳。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外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

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茆茆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

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

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线，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

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人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

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茭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

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睬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嚤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



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

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锹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锹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锹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

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

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她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

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董——建——义——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的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

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

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沒辦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

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

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 USA 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

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

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

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

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网友推荐《夹边沟纪事》故事之一】

## 从“红小鬼”到“右派”到……

——忆诗人孙静轩老师

黄晓龙

为了无声的责问不再使人颤栗  
为了一度露宿街头的画面  
不再使眼睛无处躲藏  
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  
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

为了祖国的这段空白  
为了历史的这份崎岖  
为了天空的纯洁  
为了道路的正直  
我要求真理

——舒婷

### 诗魂不仅成就于苦难

2003年7月、孙静轩老师去世当天，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和祭幛从四川省文联宿舍小院挤出来，一路摆满了长达千余米的红星路中段。诗人和学生彻夜在诗人的遗像前朗诵他的诗作，从下午直到第二天黎明。

自从当代诗歌以冷漠的背影远离这个世界的苦难，以“本来就没有打算表现任何主题和意义”的荒诞和自以为是，彻底从现实世界完成了自我放逐以来。诗人的去世，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显然不仅出于人们对这位以勇敢著称的诗人的敬重，同时也寄托着人们对“文以载道”的诗歌传统重归诗坛的渴望。

改革以来，这个“红小鬼”出身的诗人，曾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诗坛弥漫着一派自怜自艾孤芳自赏的迷雾中时，以他率真的近乎惊世骇俗般的《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二十一世纪》、《告别二十世纪》，唤起过人们深刻的自省和思考，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

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反右运动中，这个诗人也曾经以《向左进行曲》加入过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大合唱。

历史的荒谬和诡异经常让人匪夷所思：这个正在慷慨激昂地高唱着“主旋律”，毛泽东眼里的“红小鬼”，“自己人”，居然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其罪名是“顽固坚持旅行写诗，拒绝深入生活，对抗延讲精神”。

真相则是：在西南作协反右的紧要关头，他竟然公开向左派挑衅，向那个顶着“作家”头衔的女党棍叫板。

假如历史能重新选择，重回1957年的西南作协，我相信：面对众多战友、朋友、同道，一夜间沦为“右派”、“历史反革命”的残酷和血腥，面对那个手持尚方宝剑，凡对她不敬、不屑者，一律“杀无赦”的冷血杀手，他肯定还会用他特有的“白眼向青天”式的姿态亮剑：“你该不会把我也打成右派吧？”尽管他事后一样会为当初的鲁莽后悔。但在那一刻，绝不会有第二种选择。

所以，他被打成“右派”是在劫难逃——在和流氓党棍的较量中，失败的永远都是理想主义者和绅士。

我常常想，从《向左进行曲》到《二十一世纪》有多远？仅仅是三十多年的时空？是蒙冤后的家庭离散，几成饿殍，眼见身边难友一个个倒下的九死一生？是冷遇歧视下长达十几年的炼狱？是因为憧憬巴黎公社原则投身文革，而后又遭遇“走狗烹”的黑暗绝望？

若果真如此，何以同样被打成右派，经历过九死一生，同样无数次咀嚼过黑暗与绝望，一旦“改正”恢复党籍职务后，有的人的血液就失去了温度？现实世界的不公和忧虑，再也难于唤起他们的义愤？

不错，苦难能让人崇高，但同样也能让人变得冷漠、自私、猥琐和贪婪，变得没有脊梁。缘何？尽皆源于“喻于义”或“利”。

### 漫长等待下的煎熬与绝望

作为孙老师生前的学生和挚友，我不仅亲眼见证了他期待回归的漫长过程。更在亦步亦趋中受益颇丰。

1962年8月在长寿湖，在他“摘帽”后奉调去省文联报到前夜，第一次见他，他就曾得意地告诉过我：调回文联，是他在邻近某省文联任要职的战友多次斡旋的结果。显然，当时的他一直天真地以为，凭着众多战友和友人的关照，以他的“红小鬼”出身，以曾经被毛泽东誉为“自己人”的背景，重回文联，就意味着机会的回归。

那时，大约每二三十天我们就有一次书信往来，其中一封信中就有这样一段：“回到文联以来，我比任何时候都勤奋，也更自信。”根本就没有料到，前面尚有十几年的封杀和煎熬。

1963年春节。在重庆市中区马鞍山他和妻子那个简陋的家中，我们有过一次畅谈。从上午10点多钟直到下午3点多，几乎都是他在回忆讲述文学讲习所的往事，讲艾青和蔡其矫，讲同代诗人间的情谊。讲曾克们的霸道无耻和在文学上的近乎白痴。兴奋中，他甚至将几包朋友送给他的、当时珍贵异常的《龙菊》香烟硬塞给我，要我学着抽，兴致勃勃地拍着我肩头：“你试试，写诗时抽烟，灵感就会像泉水一样涌上笔尖。”（我长达四十多年的烟龄就从那时开始。）显然，对今后的创作前景，他还充满自信。

其实，在1979年凭记忆写就的《雾重庆——62年纪实，赠燕祥》中，他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被冷落抛弃的寒意：

南方的冬天，本不该寒冷

但此时却寒风凛冽，弥漫着大雾

不远处就是温泉，该去洗一洗风尘  
但温泉属于别人  
你我只能默默地厮守在没有灯光的幕后  
挨肩在长凳上，相对无言

听那迟缓而沉闷的汾水长流  
好缓慢的汾水呀，仿佛流了四分之一  
个世纪……

长期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主流之外，早已令他感到彻骨寒意，但他却似乎更愿意回避和忘却。在回避、忘却中等待希望降临。

然而、就在当年10月下旬，我去省水产训练班报到路过成都，在位于布后街的文联宿舍第三次见到他时，尽管率真热情依旧，一连两天都兴致勃勃地推着自行车，引我穿街走巷品尝豆花面、麻婆豆腐，偶遇街边的象棋弈局，总是由满怀兴趣的驻足围观，到不由自主地指指点点，最后到不顾奕者的白眼和抗议，脸红脖子粗地硬要越俎代庖……但一年多的冷遇和遗忘，已在他脸上写满了萧瑟和凄然。那时，不会家务的他，不仅要在女儿降生、入不敷出的困境中咬牙省下每一块铜板，还得在被视为异类的长期冷落下，力图坚持诗人的骄傲自信。

就在那几天的一个午夜，一觉醒来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他正泥塑木雕般枯坐在浑黄的灯下，烟缸堆满了烟头，空气里满是呛人的烟味。见我醒来，即叫我去看看他已写了大半、以凉山民主改革为题材的叙事长诗。和原来弥漫着晨雾、阳光、沙滩和浪漫遐想的《海洋抒情诗》迥然相异，字行间浸透了无助和悲凉。其中一段我至今难忘：

破烂的窗棂  
积满冰雪  
火塘的余烬早已冰凉  
干瘪的乳房没有一滴乳汁

哦、我的女儿  
我拿什么养活你？  
我的孩子  
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降生？

46

转过头来，正在床边整理被盖的他，原本尽管瘦削，但无时不散发着强悍自信的背影，竟前所未有的现出了几分佝偻。显然，遥遥无期等待下的坚持和忍耐，已令他不堪重负。

那年11月，正在省水产训练班学习，一心想将诗见诸铅字的我，向重庆《奔腾》投寄了几首短诗，不久就收到编辑部的用稿通知，称那些以捕鱼生活为题材的小诗“既富生活气息又不乏诗情画意，编辑部已决定采用”云云。令我在一夜成名的幻想中兴奋了好几天。大约二十天后，又收到编辑部的另一短简，要我务必去编辑部一趟，称有要事面谈。

元旦前夕水产训练班结束，返回渔场路经成都，我颇有几分自得地拿出编辑部的两封信，满以为会得到他的称赞或祝贺。他看完信后，竟淡淡地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好事，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听其自然。”犹如一盆冷水，令我颇不以为然。

回重庆赶到编辑部，接待我的是后来一度成为好友的岳克。原来，原拟采用的几首小诗中，有一首名曰《怒风骇浪中——写在生活的起点》，也同时被好友严中和以相似的标题、题材、立意和风格投寄到了编辑部。

严中和是经孙老师介绍，于1963年春节结识的朋友。其父严啸虎系以中将衔在成都卫戍司令任上的起义将领。严中和本人既是当时重庆颇负盛名的《五兄弟》篮球队老大，也是重庆当时知名度颇高的业余诗人。50年代中师毕业后一直在市中区各中学以代高中文学课维生。为人热肠仗义豪爽大度。在我离开长寿湖回到重庆，于饥饿绝望中苦苦坚守的日子里，他的慷慨侠义和睿智对我帮助颇多。为让我逃脱再次下乡的厄运，曾经好几次托朋友帮我找过工作。尽管因为户口问题而屡屡未果。但那份热诚和情谊则令我始终心存感激不敢忘怀。

1963年5月，当我将《怒风骇浪》一气呵成后，他是第一个读者，在连连击节叫好的同时，认为其中有颇多空间尚未发掘。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将原诗作了彻底修改。果然高出一筹，令我钦佩不已。本来，朋友间就同一题材交流唱酬，风格立意相近相似在所难免。倒霉的是：两人都在未向对方通报的情况下，前后投给了同一编辑部。尽管我和严中和都一再说明“抄袭”之嫌纯系朋友间的唱和所至。

但在当时的诗歌责编眼里，我俨然就已经是有严重嫌疑的抄袭者。就这样，我遭遇了文学生涯中第一次“滑铁卢”。

从信中得知此事后，一直对我都是直言不讳的孙老师，在长达三页的回信里，对此只有两句回应：“《奔腾》的事我知道了，记得我说过，现在还不是你发诗的时候。编辑部是你去的地方吗？明明是自讨苦吃！”

显然，他初回文联时的幻想早已被冰冷的现实浇灭，余烬下唯有冷峻和清醒。尽管这种清醒仅限于人事关系层面，还远远没有进入制度体制和政治理念的高度。

大约在1980年前后，无意间向孙老师重提此事，他沉默良久，随之一声长叹说：“其实，那个时候写诗真可怜。”令我马上想到“自讨苦吃”。在那个年代，为见诸于铅字写诗，无不是在强迫自己忘却、回避，压抑着不断被现实唤起的困惑、不平、疑问和愤怒，自欺欺人地走进虚幻的激情和意象。诗人的思想、人格是匍匐、扭曲的，脊梁是软的，灵魂早已异化，诗人已经不是他自己。

### 余烬之下

1967年5月，文革进入短暂的全民造反狂欢。在成都新建的文联宿舍，再次和孙老师重逢。一见面他就得意地问我，知不知道前几天长寿湖来人抓他的事？原来，成都两大造反组织都颇多他的崇拜者。他对人们戏称他为“黑高参”更为自得。得知有人要抓他回长寿湖批斗，当即就有数十人拦住长寿湖来人警告：只要你们敢动孙老师一个指头，今天就莫想走出成都。吓得那几人一句话都不敢多说，转身就跑，深恐被追上。

我们兴奋地从“反击二月逆流”，从似乎呼之欲出的巴黎公社民主谈起，说到李井泉当年为邀功请赏谎报粮食产量，将天府之国变成饿殍遍野人间地狱的罪恶一直没有得到深入彻底揭露……他突发奇想道：“小龙，你有没有本事在重庆或大竹拉起一支几千上万人的队伍，把李井泉也抢过去斗他半月一月，死抠‘三年自然灾害’和‘二月兵变’……”他进而兴奋地说，“以后革委会至少就有你一席，就可能左右局面。你看那些红成和815一旦掌了权，哪里还想到追究那些年饿死那么多人的真相！”

当我忧心忡忡地向他道出，如果真如此，肯定会牵扯到当年老头子的大跃进，就可能像1957年那样再次遭遇阴谋。他立刻就有几分不屑，一拍桌子，眼镜后一片从未见过的凌厉：“怕啥子？为真理而战，大不了完蛋就完蛋！老子这一百把斤不要了。砍头不过碗大个疤！”随后激动地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既像问我，又像自问：“你说，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不流血行吗？可能吗？只要真有那一天，就是要我第一个死，老子马上就去找！”随后，凝神良久，又一声长吁，颓然坐下。显然凭经验和直觉，对能否“真有那一天”，他也并无信心。

为理想牺牲，那时的大多人都不会犹豫，但如果这个理想只是画饼，甚至是陷阱呢？

果真，一个多月后再次去成都，他先前的豪气干云已荡然无存。记得推开门时，他正在里间的卧室和李南力低声谈着什么，外间桌前默然坐着一个身材高大，却瘦骨嶙峋满脸愁云，从坐姿看显然是军人的陌生人。见我到来，孙老师仅招呼了一声，依然和谈话者一脸凝重地低声交谈。那位一动不动的军人突然一声长叹：“唉，干了一辈子革命，连饭都吃不起了！”据他自我介绍，他就是孙老师多次提到过的好友，曾在总后渝办担任要职的军旅诗人高平。当我们刚要深入交谈，孙老师和李南力就已谈完，要同高平一起外出有事。行前嘱我，他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回来。果然，直到傍晚也没见他的踪影。

次日下午，再次走进孙老师宿舍，身着短裤背心的他，正双手抱腿一动不动，仿佛入定般蜷缩在藤椅上。一盘蚊香袅袅散发着呛人的烟雾，藤椅四周扔满了烟头。喊了几声，他才回过神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有烟没有。当我买回几包烟赶回宿舍时，他竟然还是姿势如前，一动不动地蜷曲在藤椅上。叫了好几声，他才呻吟般地回应：“我觉得我快要死了……”令我顿时慌了手脚，急问他是不是病了，哪里不舒服？好一阵他才抬起头来，细若游丝地回应：“别理我，我是心里难受！”眼镜后面的绝望和迷惘，泛着一片彻骨的寒意。

当时我还以为，可能是昨天外出为高平或李南力的生计奔走筹措无果，令他感受到人心的自私和冷漠所致。直到1973年，读过他以巴黎公社为题材的叙事长诗《72天》凡尔赛宫那一段后，才恍然大悟：早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还沉浸在乌托邦式的革命激情中时，凭着敏锐的直觉，他似乎已嗅出，曾经令他怦然心动的“新时期”的“四大民主”，竟弥漫着熟悉的、权谋的血腥气息。

从5月初相见时的豪气干云，到这时的沮丧绝望，仅仅只有一个多月。

次年，1968年6月和8月，我一连两次到成都“吃支左饭”（因躲避武斗而被迫外逃暂住接待站），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在前后的三四十天中，几乎从没见过他由衷的笑容。

那是一段像铅一样沉重阴暗的日子。尽管他那套里外两间宿舍，已成为由重庆来成都上访、告状的长寿湖右派难友们聚会的沙龙。这些即将再次面临清算和屈辱，面临无穷无尽批斗的贱民们，在短暂难得的阶级斗争的空隙中，强颜欢笑地享受着不知何时就将成为遥远记忆的友情、亲情和生之乐趣。几乎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大约有十来人，我认识并记得名字的有王余、曾容），当人们时而为某一关注热点议论纷纷，时而为一件趣事、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时，他却是一脸肃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躲在里间，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好几次，他都用细若游丝勉强可闻的声音对我说：“我真觉得我快要死了……”

为避免授人以柄，1969年初我返回渔场前，去信约好暂时中断通信（文革前夕，他给我的两封信曾被人偷走并抄成大字报，作为我听命于“右派”反党的铁证）。但1970年夏他却突然来信，告诉我他已去了什邡五七干校，嘱我“如有机会，你可以来什邡见我”，语调平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而恰恰那段时间，曾经有过发起组织大竹“反到底”和“煽动反军”前科的我，几次都险遭灭顶。勉力招架中根本没有料到“你可以来什邡见我”是他面临黑暗与绝望，几欲自杀前的“求其友声”。

直到1972年我才从别的老师处得知，孙老师在五七干校曾两次自杀，最严重的一次曾用白酒送服了大半瓶安定，幸抢救及时才得以无虞。而与此同时，以巴黎公社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72天》手抄本，已在成都流传。但在业已恢复的通信中，他却对此只字未提。我去信求证，他也只寥寥几行回应：“从干校回来后一切依旧，只是身体和精力尚待恢复。《72天》如能打印，我会给你留一份。”

1973年3月，我受命前往剑阁县支援当地渔业路过成都，师生两人终于劫后重逢。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见面就兴致勃勃地从《571工程纪要》谈到中国的未来，嘲笑业已复刊的文艺杂志上那些浅露直白口号式的诗歌散文，嘲笑喋喋不休的罗思鼎和梁效们的新八股。

为庆贺大难不死，庆贺从《571工程纪要》里看到了希望，午、晚两餐我们都空前奢侈地“下馆子”吃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尽管不会喝酒，没有举杯助兴，但看到希望已在到地平线上升起，比酒更醉人。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他的两度自杀，不仅是因对个人命运和人心世道的绝望，更是对曾经深信不疑，寄予莫大希望，以为公平正义将从此回归的文革的万念俱灰。更是用生命对那场欺骗和愚弄的抗议，也是对轻信和天真的自我惩罚。

残酷的生活现实是最好的导师。此时，他再也不是那个对毛，对专制和暴力革命深信不疑的“红小鬼”了，而是摘掉“右派”帽子后，又被革命现实“改造”成了真正的“右派”。

我们不由自主地将《571工程纪要》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苏论战时期批判的那些苏共的论断相互联系起来，兴奋急切却又满怀忐忑地期待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健康力量”的出现。

当年7月下旬，我返渝路过成都，恰遇孙老师急性肾病突发，随时都可能转成肾衰竭，但他脸上却始终溢满阳光和笑意，没有一丝阴霾或忧惧。和1968年时的困顿绝望相比，病中的他比五年前还要年青。

### 突破和喷发

终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僵化血腥的“两个凡是”最终无奈地寿终正寝。

1977年盛夏，我已在达县农学院任教，几次借到成都查阅资料编写讲义之便，和孙老师相聚。直



到那时，我才在他那里得知了西单民主墙，知道了呼吁邓小平复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销毁噩梦般压在10亿人头上的毛纪念堂的大小字报和传单已经铺天盖地。他激动地给我讲那个魔咒般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讲去年那个晦暗的血雨纷飞的清明，讲平反的希望和传闻。压抑不住的兴奋和期待，在眼镜片后闪着明快的亮色。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到过一张北大学生大字报的内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几十年来，它在思想路线上始终没有走出小农经济意识范畴，组织上始终执行着一条宗派主义的路线。”令我颇有茅塞顿开，眼前为之一亮之感。

科学大会召开，伤痕文学异军突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张志新事件披露，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有《人民日报》发表的白桦在文代会上《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一次又一次令人目不暇接惊喜不已。

然而，直到右派改正，直到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出任省政协常委，孙老师始终拒绝入党。

我以为，此举就他而言，是势在必然。不仅因为这个在野时曾经高举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的党，获得政权后却将自由民主视为毒蛇猛兽，将从里到外都是左派的他打成了“右派”。而后，当生活与苦难将他变成了真正的民主自由派后，却又给他“改正”。前后都充满着戏剧性的荒诞。不仅因为这个先锋队内，很多位高权重的要员，无论信仰、政治品质和道德修养都远远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那些为了私利和野心，将辩证法和“党性”的魔杖挥舞得娴熟自如的人，更让他嗤之以鼻，羞与为伍。更重要的是：自建国以来，这个党发起的众多运动，几乎都是在倒行逆施，制造着灾难和不公，践踏着革命的目标和初衷。还因为这个组织中的理想主义者和优秀分子，都在逆向淘汰中一批批倒下，一个个遍体鳞伤，余下多为“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者”和马屁精，或一心为稻粱谋者。“道不同、不相与谋”，理所当然。

他是诗人，如他所说，是“以诗为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为诗而活着，也将为诗而死去”，“我的诗，是从破碎的心渗出的泪和血”。二十几年的冰封终于开始融解，诗情就像烫人的热泉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从1978年“改正”到1981年，他几度上北京，下海南，沿海北上访山东故乡，赴云南，访江南……历尽劫难后的故友重逢，物是人非的悲喜交加，磨难和思考的积淀，使他的诗较之早年细腻空灵的《海洋抒情诗》，更多理性、成熟、现实和冷峻。

1979年初夏，从沿海采风归来路过重庆，在市文联一间小会议室里，他给我背诵了几首南海采风中创作的短诗。其中有一首《船过珠江口》——当时内地海轮每过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海域，船长都要求旅客拉上舷窗上的窗帘。深恐人们“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和诱惑”，令他颇感愤怒和羞辱。他说：

我只看到一片朦胧的灯火  
也不熟悉那些灯下的生活  
哦、船长，何必要拉上窗帘  
请摸摸我的脉搏

他依旧是一条结冰的河流  
我不是杨柳、不是棕榈  
我是一颗来自北方的松树  
离不开北方寒冷贫瘠的黄土。

经历了由人人敬羨的“红小鬼”诗人一夜间沦为贱民罪人的急剧坠落，他当然清楚平静海面下暗礁的凶险，清楚“搏击”“追求”可能会招来何种后果。但责任和使命所在，却令他义无反顾。面对随时可能遭遇覆灭的宿命，他的清醒、坦然和义无反顾，在《沉船》里，表现得尤为清晰：

水手们还在谈论那惊心动魄的故事  
对先驱者寄予了无限的崇敬和思念……  
啊、朋友、何须对死者凭吊  
也无须在沉船水域踟蹰不前  
既然选择了搏击风浪的生涯

又怎能侥幸逃脱灭顶的危险  
生者与死者各有各各自的归宿  
谁生存、谁就该探索前人不曾开拓的航线……

当那场倒春寒以“四项基本原则”的凌厉锋芒扫过中国大地，《一个幽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终于降生在1980年的10月。他率真得近乎惊世骇俗地追问：“难道我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建造的只

是一座可怕的教堂？”“难道推翻三座大山，就是为了建造另一座神庙？”“难道烧毁财神菩萨，就是为了挂上另一幅新的神像？”锋芒所指，一目了然。因此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苦恋》一起成为由最高当局下令追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代表作的典型。

自那时起直到1985年，借每年都有两三次到成都开会出差之便，只要他在成都，我们就有一次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的畅谈。那是我一生所经历过思想最活跃、最有希望，最扬眉吐气、激情四射的年代。从农村改革到历史哲学思想的突破，从形形色色的流行思潮，到朦胧诗、到小说、到报告文学，到令人忧心不已，颇多不详的特权腐败……凡感兴趣凡关心的话题无所不及。

那时我们都很天真，以为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充满创新活力的新时代已经近在咫尺。那种兴奋期待和乐观，至今想来，已恍若隔世。

终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再一次嘲弄了人们的善良和天真……

那场令世界侧目，令每一个良知尚存者锥心泣血，令国人失语噤声，始谓之为“暴乱”后又改称为“风波”的180度向后转后，1990年底，赴非洲打工前夕，我特意去成都向他辞行。他告诉我，事发前几天他曾瞒过单位和夫人，独自赶到北京，陪着广场绝食的学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凌晨又独自悄悄返回。按他提议，我们两人面朝东北，为罹难学生默哀了好几分钟。当默哀结束，他的两颊和上唇两侧的胡须上竟满是晶亮的泪痕。他说：他要把胡须一直留下去，直到平反昭雪和公开道歉的那一天。

我至今都还记得最初读《二十一世纪》时的震撼和狂喜。在诗中、他写道：

只有他们，那些人中之王	他们也在所不惜，毫不在乎
想长生不老、想万寿无疆	重要的是他们活着
……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占有	那怕活得像一个白痴
占有财产占有土地占有别人	一具行尸走肉
占有女人占有权柄占有虚荣	活得让人厌恶令人无法忍受
占有的一切的一切	也要死乞白赖的活着
为了这、即使陷于水火	……贪婪的心就像无底的黑洞，魔鬼
即使血流成河	的巢穴
即使世界就此止步、地球停止转动	滋生阴谋滋生邪恶繁衍战争
所有的生命不复存在	酝酿着世界末日……

50

对自己当年的顺从和怯懦，他更是无情严厉的拷问——

有人说我是一个真实勇敢的诗人	我只是一个影子
我深知我自己	一具行尸走肉
我绝非英雄	一个呼吸着的软体动物
我甚至像别人一样堕落	我既怕邪恶又畏惧暴力
是的，我的灵魂已死精神已死	面对血淋淋的现实
血液是冷的	甚至不敢作一个表情和手势……
凝固如化石	

在他将《孙静轩诗选》和载有《二十一世纪》的《星星》诗刊书赠我的同时，还满脸快意地给我讲起：不久前，时任文化部长、中宣部副部长的某左派旗手，五六十年代曾经以多首热情奔放、语言形象绚丽的政治抒情诗倾倒过整整一代青年的某大诗人到成都公干，通过省委宣传部欲拜访“老孙”，却被他以“我不认识这个人”一句话将其冷冷地拒之门外。

他始终用他的“白眼向青天”在不断证明着：我只属于自己，属于真实，属于民间草根，绝非庄严神圣的权力庙堂。

诗人·人性·人

1985年，我曾经拟调省水产研究所。为取得家人支持，带着五岁的儿子和爱人去郫县实地考察水研所试验基地环境，顺道带儿子登门拜望孙伯伯。本以为看到了下一代，他会高兴异常。谁知进门遇到的竟是一张颇多愤怒不屑，出于礼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随即又迅速消失的冷脸。开门后他就坐回窗前的书桌，扔给我一个冷漠僵直的背影。直到我在尴尬不解下怒气冲冲地连声追问，他才道出原委：原来当时正在川师大幺舅处探亲，二十几年来只闻其人，却从未和孙老师谋面的我的母亲，几天前径直找到他，向他哭诉了我调回重庆后很少回家的种种不孝。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告诉我：“你知道吗？我非常同情你母亲！非常同情！我恨，我最恨，最看不起不孝父母的人！”似乎为有我这样一个学生和朋友深感后悔和羞愧。然后，根本不容我辩白就劲直走进另一房间，再不理我。

那以后，将近两年，在委屈愤怒中，尽管数次到成都，我一直没有踏进过他的家门。

直到1987年5月，再也憋不住的我打上门去辩诬，向他诉说我与母亲之间被政治运动反复扭曲、割裂的关系，谁知他竟忘了两年前的伤害，反倒连声责问，为何两年没有音信，不去看他。对1985年那次冲突，他一口一个“不记得了”。当听我说起事情的原委和真相后，他才恍然大悟，连称对不起。说当时是被气昏了。说事后他也仔细想过，我绝不会是那种人云云。在哭笑不得之余，对他的人品，他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更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

最后一次和孙老师相聚是在1998年夏初。时近中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称正在重庆大坪医院附近一间餐馆，要我马上过去。

那时，已年届68岁的他，瘦削矮小的身材已现佝偻，留蓄了九年的胡须斑白杂驳，和1962年夏天离开长寿湖前夜那个腰背笔挺、胸肌和肱二头肌凸起的“打鱼仔”判若两人。饭后回到我家时，他已是一脸疲惫，蜷缩在并不宽大的沙发上，完全就是一个瘦小谦和朴实的老人，丝毫见不到曾经在各种场合语惊四座，搅起思想旋风的启蒙斗士兼诗人的影子。

这就是他“白眼向青天”的另一面——从来都不习惯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或弱点、缺憾遮遮掩掩，从来都是坦然率性的不事雕琢，以真实示人。当哭则哭，当笑则笑，真实得就像生活本身。诗人必须是人，也一样会有动摇犹豫和迟疑——只要动摇犹豫不是基于对利害得失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悲悯同情。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每当历史需要某个人，这个人就会出现在需要他的那个时刻，那个地方。

作为一个曾经走在时代前面，一直不停地追问真实和真相，向这个时代，向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宣示、要求着真理的诗人，虽然，他和造就了他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虽然“喻于义”的传统已经被生活现实不断稀释和屏蔽，甚至专制的传统和文化较之以前还更为强势。但“喻于义”的传统毕竟活力尚存。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和期待：孙静轩那样的诗人还会再度出现。因为这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夜，这个前面是急转弯的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诗人。

【交流文稿】

##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林宪君

对于辛亥革命，史学界向来予以正面肯定，评价较高。但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对辛亥革命持否定态度，认为这场革命毫无必要。理由是晚清政府已开始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渐进改良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富国强兵。还有人认为“清末民初的孙文

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革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等等各种灾难。总之，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应该避免。

笔者的观点与此相反，坚信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武昌起义擦枪走火只不过是必然中的偶然。辛亥革命的必然性源于晚清社会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满清贵族为维护皇权统治迟迟不肯进行真正的改革，致使和平改良的机遇丧失殆尽，终于酿成了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

### 一、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

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清王朝的垮台同属一个原因：即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迫切需要。大量史料证实，辛亥革命前夕的晚清政权已病入膏肓腐败透顶，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羁绊。只有搬开这块绊脚石，中国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至于满清贵族搞的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只不过是欺骗人民的幌子和手段，他们骨子里向往的仍是世袭的皇权和保护已经掠夺到手的财产。权贵们根本不愿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的，和平改良的道路已被既得利益集团给堵死，人民被迫只有选择革命的手段去摧毁这个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权。孙中山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他何尝不想通过和平改良的途经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摆在他面前的是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腐朽不堪的晚清政权已失去改良自救的可能。

晚清政权究竟腐朽到什么程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亡国三恶因》一文中作了精辟的概括：“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视中，宵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这篇写于辛亥革命前一年的百余字短文，已预见到衰败的晚清政权必然灭亡的命运。该文发表不到一年，一个貌似强大无比，繁荣昌盛的“满清”盛世就轰然倒台了。

清朝末年，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财富不在百姓手中，归权贵们所有，百姓生活极端贫穷，两极分化已很严重。社会败落之象的原因是‘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会受到惩办，整个社会已无公平正义可言。政府因循守旧不作为，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官吏们昏庸无能且丧失道德底线，只顾忙于吃喝嫖赌，买官卖官，为聚集财富，横征暴敛，不择手段。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对外则连年战败，割地赔款，签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搞金钱外交，出卖国家利益，置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

这就是某些学者所向往的“新政”。这样的“新政”是靠祸国殃民，卖国求荣来维持的。生活在所谓“新政”下的人民水深火热，反抗暴动时有发生。全国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安。清廷的倒行逆施，早就天怒人怨。政府的诚信已荡然无存，它们实行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只是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根本不会兑现，谁还去相信这类谎言？

生活在满清权贵们统治下的百姓，早已不堪忍受这种政体的奴役压迫。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农民造反揭竿而起，不甘沉沦的民族精英的各种抗争前赴后继。较为著名的有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60-1895年的洋务运动；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上这些抗争尽管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但都不属于‘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革命，均被血腥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太平天国农民造反，无非是争当皇帝，你唱罢来我登场，皇帝老儿轮流当，并无社会进步意义。洋务运动根本撼动不了皇亲国戚的封建特权，带不来民主共和的曙光。打出“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既反对外来侵略又排斥科学文明，其近似愚昧的行径非但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被专制统治者所利用。

即使温和理性的维新派向清廷上书请愿，要求政治有限的改良，也为掌权的顽固派所不容。在戊戌变法的一百天中，共有260多条奏折上书皇帝，盼望实行“君主立宪”，政治革新。其实，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救皇”派，都是忠于大清皇室的顺民，都在苦口婆心地试图挽救大清王朝即将崩塌的

命运。然而顽固的保守势力对此并不领情，他们担心大权旁落，宁肯卖国也不愿革故鼎新。顽固势力把维新派视为威胁政权稳定的眼中钉，列为敌对势力予以打压。这些可怜的‘救皇派’不是被杀就是被关。戊戌变法“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百日维新运动被扼杀于血泊中。这就是晚清政府已开始实行的“新政”和“预备立宪”。难道我们那些现代历史学者连这些基本事实都不尊重？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的一些人已在血的教训中清醒，终于认识到晚清政府是个拒绝改革，讳疾忌医，无药可救的政权，它正在坐等人民群众去推翻。维新派中的许多人最终转向了支持革命，就连反对暴力革命的梁启超，也与康有为分道扬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他在晚年曾无奈地坦言：“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此言一语中的，应列为统治者牢记的名言。

孙中山也曾对清廷抱有幻想，企望在保存满清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和平改良，以减少革命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为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钢挈领地阐述了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冥顽不化的清廷对如此温和的改革主张仍不屑一顾，态度极为冷淡，根本听不进孙中山挽救大清江山的金玉良言。孙中山的上书石沉大海，对清廷已彻底绝望。他被迫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决心采取革命手段去摧毁这个阻碍社会进步的皇族政权。可以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官逼民反。

至于某些学者所说的“预备立宪”，请看清廷的诚意又是如何？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的执政者拗不过立宪派的政治压力，终于出台了一个“皇族内阁”。内阁中13名成员，9名是皇亲国戚，内阁权力仍由皇族垄断。立宪派全部绝望，已不再寄希望于“组阁”。不久，社会各界又联合提出于宣统三年（1911年）召开国会。自以为大权在握的清廷，仍顽固地拖延应付，将民意玩弄于股掌之上，即使立宪派在其背后击一猛掌，它也不肯向前跨进一步。直到这个“皇族内阁”预感到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才主动表示要在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不幸的是，这时已经没有宣统五年了。大清王朝的气数已消耗殆尽，社会革命已不请自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各省积极响应，一切都在瞬间发生，大清帝国顷刻完蛋。

清王朝的垮台灭亡怪谁呢？谁都不能怪。只怪它自己不顺应世界潮流，不支持变法改良，不想进行真正的改革。当危机迫在眉睫，自己想变法，想改革了，时间却不等它。晚清时期，多次出现的改革机遇都被错过，多种改革方案都最终搁浅，改革一再拖延。害怕失去权力和既得利益的清政府，终于丢失了自我变革的主动权，最后只有坐等革命党人来推翻。爱新觉罗家族这些弱智脑残的不肖子孙们，不但丢掉了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还延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清王朝垮台完全是它自己造成的，这叫自作自受，自取灭亡。

## 二、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冥顽不化的清政府，一再拖延改革，只顾利用权力捞钱。1911年5月9日，在推出“皇族内阁”的第二天，就颁布了一项侵吞民众财产的法令——《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该法令宣布“铁路干线均为国有”，“即应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川汉、川粤铁路的修筑权原本属于各省股民，其资金很大一部分是股民们变卖房屋、土地、财产的血汗钱，无形中被政府从手中夺走，又拱手让给了外国人。

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朝令夕改，摇摆不定。加之又巧取豪夺侵吞股民们的财产，很快便激怒了以绅商为主的四川集资股民。他们坚决反对清廷为获得英、法、德、美四国银行600万英镑的贷款所签订的卖国贷款合同。该合同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据此条约，中国不但要忍受重利盘剥，还有丧失主权之险。

为保卫路权，四川的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组成了“保路同志军”，在成都示威游行，强烈反对把筑路权卖给外国人。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被围得水泄不通，川汉铁路公司第七次股东大会在此举行。罗纶、邓孝可等人登台演讲，痛陈时事，慷慨激昂。大喊“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讲完声泪俱下，嚎啕大哭。全场情绪激动，也跟着大哭了二三十分钟。会

后开始游行，群众手举光绪皇帝牌位，焚香磕头，要求政府兑现‘川路准归商办’的承诺，归还本属于自己的财产。

游行自始至终温和理性，只为利益诉求，并无反政府的过激行动。群众对政府某项措施表达不满，政府理应与群众对话沟通，协商谈判化解矛盾。群众维权万万不能武力镇压，清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置民众诉求于不顾，穷凶恶极地开始抓人杀人。同年9月矛盾激化，成都的保路运动已扩展为全四川省的抗粮抗捐运动，群众暴动，士兵哗变时有发生。

迷信武力镇压的清政府，自恃兵权在握，立即调动驻武昌守军前往镇压，致使武昌空虚成为革命最易突破的防线。清廷的镇压激起民愤，反而促使四川保路运动规模迅速扩大。四川总督赵尔丰见事不妙，假称朝廷已同意保路同志会的要求，并以开会协商为名，将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诱骗至总督府予以扣押逮捕。随即赵尔丰又下令查封了支持保路运动的报纸，对社会舆论严加控制，不许人民议论保路运动。赵尔丰的高压政策令民众情绪失控，他们冲击总督府，要求立即放人。利令智昏的赵尔丰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开枪，当场打死三十二人，受伤者达数百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成都血案”。事后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为死难者竖立了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以示纪念。

赵尔丰原以为靠武力镇压、大开杀戒便可平息“保路”风波，以保大清王朝搜刮民脂民膏的特权。他做梦也想不到，对保路运动这一偶然群体事件处置失当，会丢了自己脑袋，更使他效忠的主子丢了江山。12月21日深夜，自称都督的标统（相当于团长）尹昌衡率警卫部队冲进了总督府赵尔丰的卧室，当场将其擒获。第二天上午即押往贡院（今成都天府广场）当众斩首，头颅挂在树上示众三天。这就是镇压保路运动刽子手的下场。

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么诡谲，变幻莫测。端坐在紫禁城里的满清权贵们，同样做梦也想不到“皇族内阁”颁布的第一个法令竟不幸变成了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蝴蝶效应又引发了武昌起义和全国各省响应。三个月后，大清帝国便寿终正寝，彻底完蛋。拒绝改革的皇室贵族们也只好认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成都的保路运动互为因果，密不可分。没有成都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几乎不可能发生，虽然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导火索都源于成都的保路运动。二者关系妙不可言，发人深醒。

###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决不容许否定。只要尊重历史事实，不怀政治偏见，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作用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第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它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绵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帝制，埋葬了“家天下”这一人类社会的丑恶遗产。辛亥革命后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为中国的社会进步打开了闸门，也为亚洲的民族解放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第二、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废除了专制帝制，创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政体。自秦汉以来，每逢王朝更迭，不管轮到谁当皇帝都沿袭前朝的制度，换汤不换药，萧规曹随。谁也不肯改变中国专制社会的性质。“百代都行秦政制”，周而复始地轮换更替。无论农民造反或宫廷政变，谁也跳不出“兴盛——腐败——衰亡”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怪圈。旧的王朝灭亡了，又开始新一轮王朝更替。辛亥革命后，把民主共和国的种子引进了中国，实行民主选举，确立了权力更替的新秩序，从此改变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性质。只要沿着民主共和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就不会出现以血腥杀戮而掌权的王朝循环更替。

第三、辛亥革命废除了世袭制，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创造了前提。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临时约法》已具有宪法的性质；“内阁责任制”相当于国会的权利。孙

中山缔造的民主共和国已具备大总统、宪法和国会三个基本要素。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后继的执政者只要遵循这些原则，实行民主政治，中国的百姓就会代代平安受益。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大转变。它是 20 世纪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人们开始认识到皇帝制度并非天经地义，永恒不变，原来国家也可以不用皇帝来统治，国家的权力也可以由庶民百姓来掌管。孙中山几次演讲中都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他还在《革命方略》中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辛亥革命后，共和观念、共和制度已深入人心，无论谁想当皇帝或复辟帝制皆不得人心。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碰得头破血流就是明证。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专制统治者，但他们即使再专制也不敢黄袍加身以皇帝自称。

第五、辛亥革命砸碎了旧的上层建筑的束缚，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和民族资本迅速发展。民国建立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已成风气，社会财富显著增加。孙中山制定的实业建设计划以及引进外资，实行开放的主张至今仍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榜样。从辛亥革命开始，我国已在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迈进。

第六，辛亥革命后，我国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学派、各种思潮、各种理论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大师级的人物层出不穷。短短数年，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已焕然一新。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废跪拜、改称谓、倡女权、易服饰、剪辫子，提倡自由婚姻，不许贩卖人口等等，已成为时代潮流，蔚然成风，令人向往。随着皇帝制度的废除，依附于帝制的世袭制度、太监制度等等社会丑恶现象统统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场“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革命，这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其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今天自由独立于世界的国际地位。辛亥革命不可否定。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应该牢记历史，以史为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促使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发展。我是黄埔后代又是民革党员，应义不容辞地宣传辛亥革命的光辉业绩，缅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为中国的民主、独立和富强而献身的历史功勋，继承他们的遗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交流文稿】

##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贵党正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愚意以为，贵党庆祝建党的宣传也应该与时俱进，体现改革精神，不能再重复旧的宣传路数，那样对贵党形象非常不利。

具体建议如下：

### 一、不要再把党道德化。

贵党是一个政治组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1949 年以来一直处于执政地位。贵党认识到应该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么什么是执政党？按照现代政治文明原则，就是执掌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依照人民的意志为人民服务。不言而喻，人民是主人，党是公仆。不能让主人对公仆天天感恩戴德，不应再天天让主人喊公仆“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是封建时代“父母官”传统的遗毒。是把党伦理化、道德化，颠覆了现代政党的形象。

### 二、不要再把党神圣化。

贵党九十年的经历，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伟大辉煌的胜利，也有曲折的历程，沉重的教训、可怕的错误。没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大跃进”，也没有“反右”，也没有“文革”。有句话说得好：“成绩不说没不了，错误不说不得了”。有鉴于此，建党九十周年的宣传不宜只盯着成绩，甚至把党神圣化，不管党内出现了多少贪官，总是“伟大光荣正确”不绝于耳，而应该认真深刻客观地总结教训，真正提高和增强贵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品格、执政素质。

### 三、不要再把党色彩化。

贵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为全中国人民执政，而不应该为了哪家那派哪个阶级哪个集团的利益执政，特别不应代表“红色家族”执政。目下甚嚣尘上的“唱红歌”，从观念到做法（重庆最典型）都是把党通过色彩化引向极左化、文革化。当年国共内战时，红白之说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宜再把党色彩化。

马克思当年抨击普鲁士当局的书报审查制度时说：太阳照在露珠上本来五颜六色，但是当局却只允许有一种颜色。贵党既然直到今天都奉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就应该首先记取马克思的教导。

### 四、不要再把党封建化。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更应该着眼未来，而不是一味缅怀打天下的历史。不能遵循“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封建社会逻辑，而应该真正体现还政于民的现代文明原则。须知，历史的选择未必是现实的选择，更未必是未来的选择。贵党若要获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的认可，保持执政地位，真的是任重道远。这绝不是在建党纪念日喊上几句“千秋万代永不变”能够解决问题的。

以上四点，荦荦大端。此外，从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宣传来看，缺乏政治想象力，缺乏文化创意，缺乏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面貌，铺天盖地，千篇一律，形式主义，面目可憎。特别应该指出，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生活在贫困线上的民众，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宜过分铺张、穷奢极欲，挥霍公帑。建议预算节省再节省，特别建议公开建党九十周年庆祝活动的经费，让民众监督，这样会非常有利于贵党形象。

以上妥否？望示！

赵士林

## 党说你不是，你就不是

佚名

从1922年12月下旬到1923年1月上旬，病中的列宁在清醒的时刻口授了《致代表大会的信》等书信，这些长短不一的书信被后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3年1月4日，列宁在长期的考虑和犹豫之后最终下定决心要撤换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同志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遗嘱一式三份，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持有一份。列宁死后，遗嘱在苏联成为绝密文件，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少数高层领导知道内容。斯大林的残暴，使遗嘱成为无人敢提的“禁区”。克鲁普斯卡娅自恃是列宁的妻子，难免对斯大林的残暴不满，说三道四。



一天，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说：“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请你注意，不要随便乱发表意见。如果你不听劝告，我们将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

克鲁普斯卡娅说：“全党全国都知道我是列宁的妻子。”

斯大林说：“党说你不是，你就不是。”

【网友推荐】